

从“东盟主导”到“集体领导”：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转型

陆文婷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运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共同提出的“多边主义领导理论”和约瑟夫·奈提出的“共享领导理论”探讨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实行东盟、中国、日本“集体领导”的可能性。本文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东盟扮演“驾驶员”的角色,中国和日本发挥“引擎”的作用,而美国则是作为“平衡者”。这些“集体领导”成员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而非上下级的关系;“集体领导”的具体模式可能是中国和日本实现时间上的继起,分别与东盟一起领导东亚的区域合作,也有可能是三个领导者利用各自的优势,实现不同议题上的“情境化领导”。

关键词 东盟主导 集体领导 中国 日本

20 世纪后半叶,东亚地区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出现使东亚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为耀眼的新兴地区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下,东亚区域合作更是蓬勃发展,现在东亚已经与欧洲、北美并列为世界上地区一体化最具影响的三个地区。因此,对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进行研究,进而分析东亚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当前的东亚区域合作中,实行的是“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东盟为东亚区域合作设立制度框架、制定合作的机制与规则。1994 年创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1997 年创立的“10+3”^①、2005 年创立的东亚峰会,这些现有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都是由东盟所创立、以东盟为核心的,在此基础上欢迎大国的加入,进行经济和安全对话。而且东盟在自身建设中已率先形成了一套符合地区实际情况、比较完整和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与规则,即“东盟方式”。第二,几乎所有最高层次的东亚区域合作论坛或者会议都是在东盟国家举行的,如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峰会^②,东盟是名副其实的东道主。第三,东亚各国尤其是大国在自己的官方声明中都多次承认东盟的主导地位。^③

但是,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现有合作机制的缺陷。一方面,以回避矛盾、寻求共识为主旨的“东盟方式”本身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东盟很难调动大国参与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威望都大幅上升;日本的经济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仍旧维持着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地位,而且日本越来越倾向于在东亚的区域合作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对现有“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提出了挑战。加拿大东盟问题研究专家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就曾指出:“在地区秩序安排中,已经取得区域合作领导地位的东盟面临‘领导作用失灵’的严重问题”。^④鉴于“东盟主导”机制的不足,以及推

动与深化东亚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人们开始探讨究竟什么样的区域合作机制更适合东亚的实际，未来应该由谁扮演东亚地区的领导者更加合适？一时之间，对于东亚地区领导问题的研究一度成为了热点。

一、研究现状综述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来说，“地区领导”(Regional Leadership)甚至是“领导问题”都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⑤

国外学者对于东亚地区合作领导权问题的研究，大部分关注的是地区领导者本身，即探讨东盟、中国、日本或者美国谁有可能成为新的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⑥中分析了东盟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中的角色。新加坡学者林彭二(Lam Peng Er)^⑦和林华生(Lim Hua Sing)^⑧针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过分析。沈大为(David Shambaugh)^⑨、康灿雄(David Kang)^⑩也曾探讨过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问题。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登特(Christopher Dent)^⑪甚至提出过东亚领导权八种的可能实践模式。

相比较而言，国内关于“地区领导”或者说东亚地区领导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注重经验主义分析，理论运用比较薄弱。与国外学者相同的是，大部分的中国学者也是把注意力放在构成“集体领导”的成员本身而不是“集体领导”的具体方式上。其中，曹云华认为，当前东亚合作是处于起步阶段，由东盟来主导；进入初级整合阶段以后，将会有中国、日本和韩国来集体领导；一旦进入高级整合阶段，就会变成中国和日本来集体领导。^⑫而另一位学者唐小松则认为，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一定是中美日三强共治。^⑬

二、“集体领导”的现实需要

本文认为，在“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缺陷之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除了东亚地区以外，世界上地区合作发展较快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都是由大国所推动的，欧洲由法德为轴心，北美由美国所主导。而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却是以小国为主导发展起来的，因此尽管东亚的区域合作水平提高得很快，但依旧与欧洲、北美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小国的主导虽然会提高合作的灵活性，但也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力不从心的时候。

为了进一步拓宽东亚区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转型的根本并不是由中国、日本或者美国来取代东盟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者，这三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限制都不可能成为主导者。

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势头，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010年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相对而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很低，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暂时还不具备独立领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外交方面一直实行的是韬光养晦的方针，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根本无意于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地位”。^⑭

而东亚的另一个大国日本，在经济上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而且长

期以来,一直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东亚货币合作最早的两个构想,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致力于开展区域内部的货币合作,来提升共同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以及由日本设立总额为3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经济重建的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的新宫泽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⑤都是由日本提出的。但是。由于其在政治方面一直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无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⑥再加上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使其在东亚的区域合作中缺乏必要的政治影响力。

至于美国,虽然没有人能够否认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但考虑到它本身是否属于东亚国家的界定范畴尚存争议,再加上要顾全其“全球战略”的大局,这些原因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东亚,来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而且,东盟通过其自身的改革,从而完全适应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角色这种可能性也比较低。

鉴于一方面东盟、中国、日本、美国都不可能独自承担起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重任,另一方面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转型又非常紧迫,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一种既能够运用现有的合作框架、又让大国积极参与进来的区域合作方式,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不失为一种上佳选择。

与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集体领导”的成员构成方面,而是主要探讨“集体领导”的具体方式,即如何实施“集体领导”。在理论指导方面,也将摒弃国外学者所采用的把重点放在地区领导力的权力来源上、直接沿用“国际领导”中关于权力与领导力关系的相关理论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而是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共同提出的“多边主义领导理论”和约瑟夫·奈2008年提出的“共享领导理论”作为指引,探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向“集体领导”转型的可能性。

三、“集体领导”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关于“集体领导”这个问题,很多国外著名学者都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只不过表述各异,比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了“多边主义领导理论”,^⑦约瑟夫·奈在2008年提出了“共享领导理论”,^⑧都对“集体领导”的可行性进行过理论上的探讨。

在基欧汉和奈看来,领导存在着多种表现形式。一般而言,领导可意味着:(1)指导或命令;(2)率先行动;(3)诱导。这三个定义也相互对应着三种领导类型,即霸权领导、单边主义领导和多边主义领导。^⑨霸权领导是指“一个国家足够强大,可以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准则并有意愿这样做的情势”。单边主义领导是指“率先垂范并树立榜样”的一种行为。而多边主义领导是指“诱导其他国家帮助稳定国际机制的行为”,“领导国放弃谈判过程中的短期利益,以确保与稳定国际机制相关的长远利益,大国最有可能做出这样的短期牺牲,因为他们可能是机制的主要受益者,它们可能预计到自己的主动行为对世界政治的重大影响”。但是,多边主义领导与前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霸权领导、单边主义领导它们的参与者都是一元的,而多边主义领导的参与者是多元的行为体。

但是,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前两种领导形式已经不再适合当前国际合作的要求。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一方面,美国的霸权领导前景是非常渺茫的,而其他国家行使这种主导权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另一方面,单

边主义的领导形式也不是一种良善的领导,因为“从创立或维持各国都获益的机制角度看,领导国的倡议常常并没有树立良好典范。”因此,在当前相互依赖的国际大环境下,只有第三种类型的“多边主义领导”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这种“多边主义领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需要多元行为体之间分享领导权。当今世界议题众多,各种议题之间又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联系。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所有问题上都充当领导者、完全垄断领导权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在某些问题上扮演领导者的同时,在另一些问题上只能充当被领导者或者说跟随者的角色。

约瑟夫·奈在 2008 年出版的专著中也提出过类似的“共享领导理论”。他认为,我们所讨论的领导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三个要素:领导者、跟随者和环境。领导者未必是个体,也有可能是一个团体。环境既包括外部环境,也包括团体在特定情况下所追求的不断变化的目标。事实上,在现代生活中或者说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领导者与跟随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他们会根据外部环境的不同或所追求的具体目标的变化而进行身份的互换,即“随着外部环境和具体目标的改变,谁来承担领导责任也会改变”,^⑩奈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情境化领导”(Situational leadership)。所以从整体上来说,不同环境有不同领导者,最后所构成的是一种领导团体,领导团体中的个体需要共享领导权,这是一种“共享领导”的模式。在对“共享领导”模式进行过理论上的探讨以后,奈随后又指出,这种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进行过实践,比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就是左膀右臂分工合作的共享领导模式。

无论是基欧汉和奈提出的“多边主义领导理论”,还是奈提出的“共享领导理论”,他们所探讨的实质都是由多元主体来分享领导权、进行“集体领导”的可能性,他们的理论阐述对于研究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转型有很大的帮助,为探讨“集体领导”的具体方式提供了指引。

四、“集体领导”的具体模式

下文主要结合基欧汉和奈的“多边主义领导理论”、奈的“共享领导理论”和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来探讨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实行“集体领导”的可能性。主要回答三个问题:谁来实行集体领导?怎样实施集体领导,即希望领导者做什么?以及三种集体领导模式的可能性。

1、领导集团的成员构成

首先是关于领导集团的成员构成:东盟、中国、日本同为领导者,但三者之间也有细微的差别,东盟扮演的应是“驾驶员”(driver)的角色,而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引擎”(engine)。这是因为,东亚区域合作现有的制度框架、机制与规则都是由东盟设立或制定的,如果在未来的合作中需要借助这些现有的机制,那么东盟就必然在领导集团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才是这些机制的真正掌控者,而其它国家只是参与方。而且让东盟成为领导集团中的成员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在很多时候,小国往往有更加灵活的协调性,一旦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引擎”之间发生剧烈冲突,它还能起到协调作用。

而中国和日本成为领导集团的成员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日本又是一个经济强国,这两个国家在东亚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它们的角色与东盟存在些许差别,“驾驶员”需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时刻关注并指引着合作的进程,而“引擎”的付出相对较小。对中国和日本来说,扮演“引擎”的角色也许更加适合两国的实际国情。虽然近些年,中国无论在东亚地区还是国际上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

中国的基本定位还是以国内的经济发展为主,所以有限的责任也许更适合中国。而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在政治上它依旧是一个非“普通国家”,让日本承担有限的责任也许更为符合其他东亚国家的利益。让中国和日本扮演“引擎”的角色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一旦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发生问题,即其中一个“引擎”发生故障,那么离开这个“引擎”,另一个依旧能发挥推动作用,再结合东盟这个“驾驶员”的指引,东亚区域合作还是能够继续开展下去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把韩国和美国放进东亚的“领导集团”中,主要是因为:从韩国这方面来说,虽然它是东北亚地区三个主要的国家之一,但从整个东亚的范围来讲,影响力还是有限的,韩国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和东盟、中国相比,还是和日本相比,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让韩国成为东亚的领导者的底气不足。从美国这一方面来讲,之所以不把它放在领导集团当中,是因为从严格的地理意义上来说,美国是否是一个东亚国家存在很大争议,况且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它不可能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东亚的区域合作中,一旦东亚的事务不再与它的全球战略相契合,美国也不是没有抽身的可能,所以把它放在领导集团中显然是不合适的,也许东亚区域合作的“平衡者”(balancer)更适合美国。

2、实施“集体领导”的方式

在确定领导集团的成员构成以后,接下来要讨论实施“集体领导”的方式,即领导者们要为区域合作提供什么,或者说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希望领导者们做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领导的定义进行一下辨析。

可以肯定的是,在东亚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各国希望的是“领导者”而非“主导者”,领导和主导这两个词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领导”的定义是“率领并指引朝一定方向前进”^①;约瑟夫·奈认为“领导是帮助团体创建并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领导者在团体中发挥的作用是确定意义和目标,确保秩序,并动员团体协同工作”^②;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领导被视为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而非剥削其追求者或追求自我声望”,^③是一个积极的概念。

通过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领导和主导或支配有很大的不同。领导者与其他成员是相互平等的关系,可以想象成在“队伍前面或者队伍中间和大家一起走”^④,为大家提供公共资源,引导或者指导大家建立相关的制度框架,推动大家前进,是一种“带领他人实现符合群体需要的共同目标的行为”^⑤;而主导或支配则表明领导者与其他成员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由东盟、中国、日本所组成的领导团体在东亚的区域合作中应该起到的是“领导”作用,而不是“主导”或是“支配”东亚的区域合作。这就意味着,这三个国家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是并不是上级命令下级,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先经过协商设立符合东亚国家共同利益的目标,再带领各国对现有的制度框架如“10+3”、东亚峰会中不足的地方进行改进,设立合作的规则和模式,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区域合作提供公共资源,并主动维护合作的秩序,真正做到以理服人,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的展开。

3、三种“集体领导”模式的可能性探讨

对于上文中奈所提出的不同“环境”或者“情境”,在现实中可以有三种理解:(1)不同的背景或者说不同的时间段;(2)不同的领域;(3)不同任务或不同议题。与之相对应的三种“集体领导”的模式就是:(1)领导团体中的成员在不同的时间段各自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从而达到时间上的继起;(2)领导团体中的成员在不同合作领域各自扮演领导者的角色;(3)领导团

体中的成员在不同任务或议题上各自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是,这三种“集体领导”模式并不是全都适合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集体领导中各个成员在不同时间段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达到时间上的继起。这种情况是东亚区域合作中部分适用,但这里所说的适用并不是针对所有集体领导的成员而言,并不是说东盟、中国、日本分别在某一段时间独自领导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因为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东盟在领导集团中应该扮演“驾驶员”的角色,而“驾驶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时间上的继起仅仅是针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引擎”而言的,即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由东盟和中国进行领导,在另一段时间,由东盟和日本进行领导的情况。之所以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根据是,从历史上来说,中日两国的兴衰都是呈交错状的。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历经济快速增长、国家逐渐兴盛的时候中国处于衰弱摸索期;而目前中国兴盛的时候日本又处于衰落期,经济发展停滞,开始走下坡路,两国几乎没有出现过同时兴盛的状况,^②而国家兴盛又是一国有精力与能力推动对外合作的基础,所以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引擎”相继与东盟一起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实现“集体领导”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一。

第二种情况,领导团体中的成员在不同合作领域各自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即在未来的同一时间点上,由东盟、中国、日本分别在不同领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原因在于:虽然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环境等,而且这三个国家在不同领域也有各自的优势,但在当前的国际合作中,各个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多的合作议题可能是跨领域的,所以完全根据领域来划分不同国家的领导角色也是不恰当的。

第三种情况,领导团体中的成员在不同任务或议题上各自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这种也是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可能出现的模式,即在某些基础性、框架性的议题上,由东盟来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比如“10+3”、“东亚峰会”;而在其他议题上,由中国或者日本根据各自的优势来领导,比如在朝核问题上,鉴于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由中国来主要发挥领导作用、结合美国的“平衡作用”也许更容易推动安全领域的合作。而在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发展援助等问题上,日本可以凭借之前所积累的深厚经济实力,也许更适合发挥主要领导作用,推动东亚在这些问题上的区域合作。^③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实现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由“东盟主导”向“集体领导”的转型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集体领导”的参与者是东盟、中国和日本,其中东盟扮演“驾驶员”的角色,中国和日本发挥“引擎”的作用,美国虽然不是“集体领导”的成员之一,却可以发挥“平衡者”的作用。而“集体领导”成员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非上下级,所谓的“领导”是经过协商设立符合东亚国家共同利益的目标,带领各国对现有的制度框架中不足的地方进行改进,设立合作的规则和模式,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区域合作提供公共资源,并主动维护合作的秩序,真正做到以理服人,积极推动区域合作的展开。而“集体领导”的具体模式可能在中国和日本实现时间上的继起,分别与东盟一起领导东亚的区域合作,也有可能是三个领导者利用各自本身的优势,实现不同议题上的“情境化领导”。

注 释:

①指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举行的会议,按参与主体不同可以分为三类:10+3 领导人会议、10+3 部长会议、10+3 高官会议。

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 (APT Summit)1997 年创立,截至 2011 年已经举行了 14 次,其中第 1-3 次称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 4 次开始正式更名为领导人会议,都是在东盟的成员国举行,第一次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二次于越南河内、第三次于菲律宾马尼拉、第四次于新加坡、第五次于文莱、第六次于柬埔寨金边、第七次于印尼巴厘岛、第八次于老挝万象、第九次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第十次于菲律宾宿务、第十一次于新加坡、第十二次于泰国华欣、第十三次于越南河内、第十四次于印尼巴厘岛。

③丁义平:《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第 30 页。

④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98 页。

⑤Christopher M. Dent, *China, Japan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276.

⑥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

⑦Lam Peng Er, *Japan's Peace Building Diplomacy in Asia: Seeking a More Active Political Role*, Routledge, 2009.

⑧Lim Hua Sing, *Japan's Role in Asia: Issues and Prospect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4.

⑨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⑩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⑪Christopher M. Dent, *China, Japan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⑫曹云华:《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权问题》,《东南亚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4-10 页。

⑬唐小松:《三强共治: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2 期,第 10-15 页。

⑭刘少华:《论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能力》,《当代亚太》,2007 年第 9 期,第 41 页。

⑮“A New Initiative to Overcome the Asian Currency Crisis - New Miyazawa Initiative,”http://www.mof.go.jp/english/international_policy/financial_cooperation_in_asia/new_miyazawa_initiative/e1e042.htm.

⑯武心波、王潇潇:《“主导权”之争与东亚多边合作》,潘忠岐主编:《多边治理与国际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4 页。

⑰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3 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40-246 页。

⑱约瑟夫·奈:《灵巧领导力》,李达飞译,中信出版社,2009 年,第 12-34 页。

⑲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241 页。

⑳约瑟夫·奈:《灵巧领导力》,第 20、32 页。

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807 页。

㉒约瑟夫·奈:《灵巧领导力》,第 18-19 页。

㉓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p.207; 转引自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241 页。

㉔朱明权:《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6 页。

(下转第 15 页)

从中日关系看东亚合作的模式

西仁塔娜

内容提要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启动了东亚合作制度化进程,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直接动力。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区域合作成为内在的需求,为合作提供了利益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东亚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模式,即小国领导、大小国共同推动的进程主导型多重合作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合力”作用的影响,其中,中日关系及其各自不同的区域合作战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东亚合作模式”。

关键词 东亚合作 合作模式 中日关系

一、东亚区域合作模式的特征

所谓区域合作模式,“是指区域合作方式和特征问题,即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实现区域合作目标,这种方式有什么特色。”^①东亚作为一个地区,逐步发展出共生的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关系,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享利益,因此东亚合作有着东亚地区主义的内在基础。1997年金融危机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启动器,而共同利益基础是相互依赖。自1997年以来,正式确立的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体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东亚地区合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多元、多重形态。本文所指范围的东亚合作模式就包含五种机制,^②更不用说更广泛意义的地区概念了。这些机制相互交错叠加,形成了多层次、多平台的治理模式。各机制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分工也不甚清晰,这样就难免产生功能上的重叠交错。东亚地区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大。东亚合作在遵循区域合作一般规律的基础上,遵循本地区多样化的特点,不断发展着多层治理模式。

其次,东亚合作是过程主导型合作,^③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进程,而不像欧盟那样是以法律制度 and 正式制度为基础的结果导向型合作。具有约束性规则的较高制度化水平是一个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因为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可以达到一种预期的效果,在这种环境下各方行为比较容易预测。^④欧盟是这方面的典型,而东亚则不然。东亚模式强调“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组织性”,同时却高度重视维持、维护和平衡各种合作过程。^⑤东亚合作从务实需要开始,强调参与者的完全平等与协商一致原则,地区合作进程更多地体现一种“功能性建设”(functional institutional building)的特征。^⑥

第三,东亚合作是小国主导、大国和小国共同推动的合作过程,其中东盟是领导者或驾驶员,而“10+3”机制是东亚一体化合作的主渠道。一开始,东亚地区合作一直是东盟发挥领导作用,合作是由东南亚小国开始实践的。在这样一种过程主导的合作机制中,权力主导不

像欧盟那样具有关键作用,平等协商原则更为重要。在东亚,不仅东盟国家坚持东盟主导作用,该地区大国也一直承认东盟的领导作用,^①因此,合作往往是由东盟向外辐射至其他国家。

第四,东亚合作是开放性的合作,这是由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这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亚,美国并不支持地区多边主义,而是坚定地支持美国和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双边主义,由美国主导的双边关系网络使得亚洲的多孔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②另外,东亚的合作起始于东盟,而东盟作为非地区大国在主导地区合作进程中需要不断实施开放的地区政策,使各种权力关系得到有效平衡,使各种错综复杂的合作进程相互影响和制约。

东亚合作是过程主导的、灵活渐进的多元多重合作模式。东亚合作的历程表明,东亚地区存在这一多层次、功能型机制确实改善了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动着地区一体化进程。

二、东亚合作框架中的中日关系

在东亚合作中,中日关系有何特殊意义?中日的竞争与合作决定着亚洲的经济命运,没有中日的合作就没有与欧洲平行的亚洲。欧盟的成功,区域内德法两大国发挥核心作用是一个关键,中日两国同样需要这样的思维转换和政治魄力。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是由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政治上,中日关系是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框架的重要支柱;经济上,中日经济关系已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一环,在东亚地区一体化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两个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对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纵观冷战后时期中日两国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曲折”。在这一曲折关系中最显著的表征是“政冷经热”。冷战后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如此的转变,其背景在于东亚出现的结构性双重变化,即中国由政治大国转向经济大国的真正崛起以及日本从经济大国上升为政治大国的努力引起的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东亚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两强并立”的局面,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东盟国家,都需要一些时间先接受然后慢慢去适应这种环境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磨合期”。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潮流的迅猛发展,作为地区大国的中日两国越来越重视地区合作,都希望在维护各自国家最大利益基础上推动区域合作、从中获利,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竞争性合作”关系,各自的东亚合作战略也出现了一定的差异甚至冲突。

1、经济贸易领域

日本在19世纪末形成了“脱亚入欧”的思维定式,战后又形成了以“脱亚入美”为特征的对外战略。作为地处东亚的经济大国,日本从未放弃参与和主导东亚经济合作的目标,但“日本有着西方一员的自我定位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③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其在推进东亚合作中应发挥的作用。1990年,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时,日本起初表示积极支持,后来又因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表示反对。日本对亚洲合作的姿态时冷时热。日本是东盟各国的主要贸易对象之一和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使日本在东盟各国拥有很强的影响力。然而,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严重限制了日

本与东盟发展制度性合作关系,使其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大打折扣,同时也对区域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2003年,日本在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展的触动下改变了一度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对东亚合作重新积极起来,主要表现在货币合作、双边自由贸易区(FTA)战略和“东亚共同体”对策上。

200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日本的 FTA 战略》,该报告涉及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内容中格外引起注意的一点是,按对日本最有利的顺序来实施 FTA,优先考虑韩国和东盟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国,其次是东盟的其他成员,最后扩展为日本与整个东盟的 FTA。报告把中国排除在最初的考虑对象之外,其理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本需要时间观察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方面的情况。^⑩但报告也承认,无论从中日双边还是区域一体化目标来看,把中国始终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只能放到最后阶段考虑。建立“中日韩 FTA”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只有完成日韩 FTA 之后,才能吸收中国加入。日本的 FTA 战略体现出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基本政策和利益取向。这套战略归根到底是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的,其目的是确保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权,这从其精心选择 FTA 对象,确定先后顺序及把中国放在最后考虑等战略设计上清楚地反映出来。

2004年10月7日,温家宝在第七次“10+3”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的建议,表明中国积极推动“10+3”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对此,日本备感压力,如果继续倡导东亚自由贸易协定,有步中国后尘的感觉。为超越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构想,主导东亚地区合作,只能另辟蹊径,提倡建立经济伙伴协定,以便占据东亚经济合作理念和政策方向上的制高点。^⑪2006年8月23日,在东盟与日中韩经济部长会议上,日本提出了东盟10国与日、中、韩、印、澳、新等6国建立东亚经济伙伴协定的构想,并将这一计划推向东亚国际合作进程,企图以这种大的战略思路和计划排挤中国此前提出的东盟与日、中、韩(13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主导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2008年4月,日本与东盟签订了《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EP),协定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与各领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与此同时,日本也与大多数东盟成员国签署了双边 EPA 协定。^⑫

中国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各类区域经济合作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在“10+3”合作框架形成之前,中国就积极参与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北亚图们江流域开发合作、东南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等次区域合作。而自从“10+3”框架出现以来,中国更明确地把区域合作重点放到东亚,成为推动该进程的重要力量。中国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两者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就10年内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并于2002年11月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首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成果。2009年8月15日,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中国—东盟经济部长第八轮磋商会议上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该协议的签署宣告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的所有谈判顺利结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如期启动。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2010年达到2927.8亿美元,并朝着2015年5000亿美元的目标顺利迈进。

2、金融货币领域

促进使用、储备甚至依赖日元,形成“亚洲日元圈”是日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其实现多极化软着陆的阶段性目标,日元国际化战略则成为关键手段。^⑬日本政府内部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曾提出日元国际化政策。1999 年,面对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和地区形势新变化,日本大藏省推出了“面对 21 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应对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形势剧变”,正式启动了“日元国际化战略”,并提出日元国际化首要“阵地”是亚洲。然而日元国际化在战略上一直排斥与中国合作。^⑭正是由于排斥中国以及尚不能改变依附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一现实原因,日元国际化战略未取得实质效果。日元国际化战略走入误区后,日本调整了日元圈战略,开始以“亚洲共同货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软着陆”。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从亚洲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建议日本政府通过在亚洲建立仿效欧元的共同货币,主导亚洲货币体系,实现“日元圈”历史夙愿。^⑮前任日本央行国际局副局长大西义久则在《亚洲共同货币》一书中提出了日本版“亚洲共同货币”的具体步骤,建议首先推动亚洲货币实现“钉住篮子货币制度”,之后再形成类似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亚洲共同货币(ACU),使各国货币与 ACU 联动,最后实现亚洲货币统一。^⑯但大西的“亚洲共同货币”并没有包括日元,仅将亚洲各国货币捆绑起来放进一个篮子,日元被摆在“地区货币篮子”之上,成为各国货币钉住的锚。日本原中央银行行长速水优则进一步从东亚货币体系角度,直接主张日元必须置于“亚洲共同货币”之上,使亚洲货币跟随日元而动,建立以日元为“轴心”的地区货币体系,引导亚洲货币合作走向“日元汇兑本位制”。^⑰如此,日本央行便成为“亚洲的央行”。不过,对于日本主导的“亚洲共同货币”能否建立起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信赖关系,日本一些主流舆论表示怀疑。

“亚洲共同货币”之路,实质上是探索东亚各国货币协调走向国际化的历程,是地区合作的新尝试。作为地区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日本与中国的战略和解是关乎其能否最终实现的政治基础。日元与人民币的关系对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合作与地区经济合作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在同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部分东亚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人民币和对方货币的互换协议。对中国来讲,尽管具备成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潜力,其人民币也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实际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经济的“发展中”特征、金融市场不健全、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使中国在短期内尚无法承担起核心角色。^⑱另外,无论是崛起中的人民币还是战略转型中的日元,都无力单独挑战美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因此,从现实来看,对中日两国而言,在货币领域开展长期的、积极的协调与合作,符合两国以及东亚的共同利益。

3、“东亚共同体”战略

2003 年 12 月 1 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峰会上,双方签署了《东京宣言》(全名为《致力于新千年富有活力而持久的日本—东盟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⑲这也反映了日本欲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在 2009 年 9 月的 20 国集团峰会上,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再次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主张。日本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抑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它还包括更重要的安全方面的考虑。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来看,不管经济合作进展如何,日本都将会推进与东盟在政治和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由于中国地处东亚的核心,拥有国土和人口上的优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与东盟合作的深入开展,使日本产生了危机感。特别是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率先走出阴霾。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经济萎靡不振影响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作用。为避免在亚洲合作中孤立和被

“边缘化”，保持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小泉纯一郎、鸠山由纪夫等日本领导人才多次提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日本无法单独与中国形成平衡，所以日本试图建立由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印度参与的“东亚共同体”，与中国形成均衡格局，这也是“东亚共同体”要吸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并将合作范围扩大到政治和安全保障领域的根本原因。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加入将有助于日本政治目的的实现，因为这些国家都属于美国亚洲战略“链条”上的一部分，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

中国方面，尽管它一直以来有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的动机和行动，但并没有清晰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战略。直到2009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中国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路线图：“以10+1机制为基础，10+3机制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重要战略论坛，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前进”。^⑨2010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会见鸠山由纪夫首相时表示了“携手推进本地区贸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亚洲一体化建设不断迈出实质性步伐”的愿望。^⑩同样，2010年5月，温家宝总理出席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话语中提到“东亚共同体”，他说，三国应保持合理的政策力度，为本地区经济的稳定复苏和长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活力。^⑪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态度就是尽量避免正面论述“东亚共同体”构想，在经济合作的意义上同意将其作为长远目标。^⑫

在传统安全领域，大国关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地区安全局势的基本走向。其中，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对安全政策的选择以及两国能否开展有效的合作，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及安全合作趋势。目前，中日两国在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一方面，在日本，“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在中国，民众对日本认知有所恶化，中日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安全困境，而缺乏互信是中日两国产生安全困境的最重要原因。

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中日双方对东亚成员国范围界定方面存在不同的主张。日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开放的共同体，最大限度地吸纳合作成员特别是与其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才能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目的不仅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有出于消除周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考量，以及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政治目的。虽然中国也赞同开放的地区主义，但中国更主张以“10+3”机制为平台和主渠道，带动其他次区域机制，制度性合作与非制度性合作并举兼顾，多渠道推进东亚合作。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战略思想就像它的外交战略一致，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重点是美国以及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另一方面，重视传统的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因此，日本一直坚持把大洋洲国家甚至印度和美国拉拢进东亚合作框架内。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和日本各自的东亚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它们战略利益博弈的核心就是主导权之争，即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按照区域领导者和主导国的界定标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必须具有推进区域合作的思想 and 意愿；二是在区域内具有全面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三是区域合作必须成为主导国的政策重心所在。^⑬东亚的两个主要大国中国和日本都不具备自主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能力。在东亚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下，哪个大国都难以胜任主导地区合作的重任。一方面，中日在历史上曾先后成为本地区的最强国，目前又出现了国力均衡化趋势，且其历史积怨和竞争心理根深蒂固，在未来相当时间内都将难以接受对方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际环境下，东盟曾以平衡策略发挥了“小马拉大车”的作用，成功主导了东亚经济与安全合作进程。亚洲

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实力和凝聚力有所削弱,但它对中日任何一方乃至中日携手主导东亚合作依然抱有高度警惕。另外,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也使任何一个大国主导东亚区域合作大大加大了难度。

中日是否应该采取法德模式在区域一体化中推进两国关系?法德模式对中日关系是否适用?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原因是中日两国跟法德不一样,在历史认识、文化价值观和国力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地区意识薄弱,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强烈。^⑤中日之间的关系只能在国家经济利益的优先性基础上推进。从长期来看,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如果它们东亚合作战略的目的都是排斥对方,那这种合作最终可能导致亚洲出现新的分裂,从而影响区域及经济合作的全面展开。

三、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亚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两强并立局面。东亚结构变迁直接影响中日关系和东亚稳定,同时两国对东亚区域合作态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相对消极变得积极起来。如果说,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本身意味着中国早已拥有在东亚体系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先天优势”,那么世纪之交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对日本的赶超,则使得中国成为该体系名副其实的核心大国。

在欧盟那样结果导向的合作中,权力主导是个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地区大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就像德国和法国一样。然而在东亚,由于中日在地区合作战略上的差异、利益冲突的无法调和以及对相互意图的猜忌,使两国不能共同扮演领导区域合作的角色,区域合作的权力中心始终是东盟这四匹“小马”。东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合作局面,既有东盟自身努力的因素,更是东亚地区主要国家相互博弈的结果。^⑥中国多次重申“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不谋求支配性地位。为了阻止中国在东亚发挥主导性作用,日本开始鼓吹“东亚共同体”来应对中国倾向的“10+3”模式,拉拢和邀请域外大国,从而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中日在推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战略差异,为东盟发挥独特作用创造了客观环境和外部条件。随着区外大国主要是美国近年来对其亚太战略的强调和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参与,中日在东亚框架下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影响东亚合作进程的实质性发展。

权力主导的缺失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东亚合作强调进程胜于强调结果,因为由于权力主导国的缺失,东亚合作不能形成具有较强制度法律效应的结果导向型合作,它只能是一个进程主导的功能型合作。制度缺失给东亚地区合作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因为硬性约束的缺少使得区域合作不具备相应的稳定性而充满不确定性,始终处于灵活多变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停滞和倒退。另外,东亚功能型合作的“溢出”效应也并不明显。该地区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启动最早、效果最好。然而,东亚地区合作只是展现了经济合作一片繁荣的景象,并没有引起其他领域的连锁反应,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景黯淡。更何况,东亚经济合作相对来说还处于一个低级阶段,如果区域大国不扮演积极的角色,相互协调利益来推动地区合作的话,经济领域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往往会因为区域大国间的分歧和制度的缺失而出现停滞,更谈不上“溢出”效应了。

这种过程导向的功能型合作,进一步导致了大小国家之间形成多种合作的组合,使地区

合作呈多元多重形态。东亚各国对“主权让渡”极其敏感,主张通过发表声明和宣言等方式建立合作平台,从而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合作模式。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合作气候中,各国可根据自身国家的利益,较自由灵活地形成各种合作框架。这种多元多重合作模式虽然一方面符合东亚国家间的多样性特点,但另一方面由于功能的重叠以及责任义务的不清晰,反而可能会影响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在东亚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下,东亚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合作模式。特殊的力量结构严重制约了东亚地区合作向深度发展,^①造成强势国家主义和弱势地区主义畸形并存,表现为地区多边治理的倾向明显而动力不足,总体上缺乏行动主义。区内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相互掣肘与不信任,中日两个核心国家之间难以展开有效合作。^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东亚合作发展滞后的问题在于,该地区一体化的高昂的政治成本。而东亚这种高昂的政治成本不是来自于东南亚,更多地来自于东北亚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如果没有东北亚一体化的首先实现,将难以突破东亚一体化面临的政治成本的障碍。最终实现东亚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只能是东北亚自身的一体化,也就是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③

四、结 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投资和贸易网络使得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发展相互依赖。但是这种关系的构造主要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缺乏地区层次上的制度支持,因此,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一旦发生危机,这个网络的内部联系机制就会发生断裂,一国发生危机后,会立即扩散,导致一损俱损,造成地区范围的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了东亚合作的启动器,促使合作制度化,使其由市场主导向政府主导方向发展。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两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不同战略考虑、缺乏政治互信以及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差异成为影响东亚合作的关键要素之一,对该地区合作机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亚模式”——小国主导、大小国共同推动的、过程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

注 释:

①张蕴岭、沈铭辉主编:《东亚、亚太区域合作模式与利益博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②东亚合作框架是个复杂的系统,东盟与中日韩这一范围内就包括四个合作平台:“10+3”;“10+1”;东盟;中日韩。较大范围的还有东亚峰会的“10+6”机制,以及更广范围的合作模式,如东盟安全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东亚合作限定在“10+6”机制内。其中,东盟是东亚合作的主导者,“10+3”是主渠道,这五个合作机制相辅相成,平等并进,共同推动着东亚地区的合作。

③黄大慧主编:《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东亚的崛起及其秩序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④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争鸣》,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⑤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⑥Jusuf Wanandi, “Toward East Asian Community Building,” APAP, JCIE paper, 2004, p.12.

⑦杨洁篪外长在2010年3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参见 <http://www.fmprc.gov.cn/chn/pds/sp/t662298.htm>。

- ⑧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64页。
- ⑨金熙德:《21世纪的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 ⑩同上,第212页。
- ⑪周永生:《21世纪初日本对外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71页。
- ⑫2009年10月1日,日本—越南EPA生效,至此除了老挝、柬埔寨、缅甸三个国家以外,日本与其它7个东盟成员国之间签署的EPA协定全部生效。
- ⑬刘军红:《人民币与日元:对手还是伙伴?》,《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 ⑭不仅日本财务省的《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报告没有提及如何发挥中国作用,日本其他机构的日元国际化报告也无一例外地回避人民币的作用。特别是2002年日本国际论坛发表的“东亚共同体战略报告”,更以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为名,将之排斥在日本主导的“东亚货币圈”之外。
- ⑮刘军红:《人民币与日元:对手还是伙伴?》,第47页。
- ⑯同上,第48页。
- ⑰同上,第49页。
- ⑱李晓主编:《后危机时代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人民币与日元的协调是可能的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8页。
- ⑲日本官方首次提出“东亚共同体”是在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出访东盟五国时发表的外交政策讲话中,而《东京宣言》中这一倡议正式被写入官方文件。
- ⑳《中国提出东亚共同体路线图》,《东方早报》,2009年10月26日。
- ㉑《胡锦涛主席会见日本首相菅直人》,《人民日报》,2010年6月28日。
- ㉒《温家宝出席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人民日报》,2010年5月31日。
- ㉓刘建平:《东亚的中国:地区政治经验与地区主义思想》,《世界政治与经济》,2011年第6期,第53页。
- ㉔李晓、丁一兵:《现阶段的东亚金融合作:面临的挑战及政策建议》,《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3期,第28页。
- ㉕高兰:《冷战后的日本对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 ㉖秦治来:《对东亚区域合作“开放性”的再认识》,《当代世界》,2011年第8期,第35页。
- ㉗鉴于行文的需要这里重点强调此因素,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包括复杂的历史原因、区外霸权的强力介入和离岸平衡以及东南亚小国联盟对外部控制的担忧等。
- ㉘张建新主编:《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地区一体化的新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 ㉙乔林生:《东亚合作与中日两国的政策选择》,《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第62页。

(西仁塔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上接第7页)

- ㉚刘建军:《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 ㉛武心波、王潇潇:《“主导权”之争与东亚多边合作》,第172页。
- ㉜曹云华:《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权问题》,第10页。

(陆文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贺平)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研究

——以《朝日新闻》关于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访日报道为例

王怡静

内容提要 本研究聚焦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访日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事件,以《朝日新闻》关于领导人访日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法,纵向比较《朝日新闻》对于不同时代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的报道特点有怎样的变化,通过报道议题分布和中国形象两个层面来分析《朝日新闻》建构的媒介图景,并尝试从两国的传媒制度、政治外交、国民心态等角度来分析成因。

关键词 朝日新闻 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 媒介建构

中文成语中有一个词叫“一衣带水”,原意是指“水面像一条衣带那样窄”,指虽有江河湖海相隔,但距离不远,不足以成为两地交往的阻碍。这个词用来形容中国与日本的渊源再恰当不过。虽然有海域相隔,却隔不断亚洲这两个古老的国家互相往来。在两国人民两千多年恩恩怨怨的交往中,既有和睦相处、互相学习的时代,也有挥之不去的血泪史。全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出像中国和日本这样一对既有悠久的交往历史而相互关系却又充满曲折和坎坷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中日两国人士的不懈努力,中日两国于 1972 年实现邦交的正常化。随着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邓小平的访日,中日关系步入新的历史篇章。中日建交的 30 多年间,虽然中途有因日本领导人对华政策的改变而使中日关系陷入低迷,^①但中国几代国家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损”,中国一直致力于中日和平友好发展。最好的例证之一就是,中国的第二、第三、第四代国家领导人都出访过日本,每次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日本媒体都给予高度关注。本研究将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访日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事件,为国人了解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提供参考。

一、研究缘起与方法

现代新闻媒介作为整个信息社会传播系统中最强大的力量,从诞生之始,便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包括国际事务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公共事务中,进而参与、影响国际关系。所以,想要更好地了解中日关系,以媒体为切入口是个很好的选择。

据笔者统计,中日建交 30 多年来两国主要领导人互访近 60 次,其中中国主要领导人访日达 38 次。^②这不禁让人好奇,当 1978 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日本媒体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日这一事件是怎样建构的? 30 多年间,日本媒体对中国国家领导人历次访日的报道又有何变化? 日本媒体对这一政治事件的报道呈现与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有怎样的互动

关系？

鉴于此,在 30 多年间中日两国领导的近 60 次互访中,本研究挑选 1978 年邓小平访日、1998 年江泽民以及 2008 年胡锦涛访日三次代表事件,以《朝日新闻》对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访日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进行内容分析,纵向比较《朝日新闻》对于不同时代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的报道特点有怎样的变化,通过报道议题分布和中国形象两个层面来分析《朝日新闻》建构的媒介图景,并尝试从两国的传媒制度、政治权利、国民心态等角度来分析成因。

选择《朝日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因为《朝日新闻》作为日本三大综合性日文对开报纸之一,凭借着长期 830 万份以上的朝刊日销量稳居全国性报纸第二。该报一直以来坚持“不偏不党”的办报方针,具有广泛的读者群和鲜明的政治立场。

在中国主要国家领导人的 38 次赴日访问中选取以上三个具体事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三次对日访问的主角正是三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且三次访日都处于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具有历史意义。

1978 年 10 月 22 日,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 57 天,邓小平作为国家副总理应邀访问日本,为期 8 天。这是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同时,邓小平访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这一指导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文件的互换仪式。

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是在 1998 年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30 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且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20 周年之际。

2008 年 5 月 6 日至 5 月 10 日,胡锦涛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 10 年后的再次访日。这次访日的行程历时 5 天,且只到日本这一站。这是多年来中国高层外访所少见的,且 200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30 周年之际,备受中日媒体关注。

其次,通过在《朝日新闻》数据库的搜索,在历次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的相关报道中,以上三次的报道量最多,资料较为丰富。且由于三次事件在当时都备受各界关注,所存的相关资料较多,比较有利于开展研究。

在《朝日新闻》电子数据库中,以“国家领导人名字”辅以“来日”、“访日”、“日中”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检索日期范围为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在日期间以及前后 30 天的报纸,^③得到 248 篇报道。剔除与访日无关的报道,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210 个,其中关于邓小平访日有 108 个样本,江泽民访日得到 69 个样本,胡锦涛访日得到 33 个样本。对以上样本,下文将从议题分布和中国形象两个层面来进行内容分析。

二、报道议题：“领导人会晤、仪式”的报道议题成主角

在媒体无孔不入的时代,媒体的内容对于受众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引导其对事件的认知,甚至左右其对事件的态度和行动。尽管新闻报道追求客观、平衡等原则,但通过材料的选择、消息来源的取向以及记者的陈述用词等,媒体对于同一事件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信息,进而影响受众的态度。

媒体在报道相关事件时涉及的议题分布能很好地反映出媒体对材料的选取过程以及采取的立场。根据报道主要内容,本研究将报道议题分为中日关系、领导人会晤和仪式、经济文化交流、领导人社会文化活动、中日争端、价值理念(如人权、自由等)、领导人个人特写、

其他国际关系、各方反应、其他等十个类别,并且通过对报道文本的分析判断报道对相关议题的倾向性是正面、中立、负面或者未提及。^④

在判断新闻报道倾向性时,主要参考报道的标题和前三段的立场,因为这一般是一篇报道最重要的部分。分析样本中标题和每一段新闻,并根据其倾向性对其赋值,+1和+2分别代表“相对正面”和“正面”,0代表“中性”,-1和-2分别代表“相对负面”和“负面”。将每个样本的这四个数字相加,其和为正数则纳入“正面”,若其和负则纳入“负面”,其他0则纳入“中立”,无法考察倾向性则归入“未提及”。

经过分类统计,得出表1和表2。

表1:《朝日新闻》对于中国三位国家领导人访日报道的议题分布

议题与事件	邓小平访日		江泽民访日		胡锦涛访日	
	(篇)	(百分比)	(篇)	(百分比)	(篇)	(百分比)
中日关系	6	5.56	12	17.39	9	27.27
领导人会晤、仪式	31	28.70	21	30.43	10	30.30
两国经济文化合作交流	3	2.78	11	15.94	5	15.15
领导人社会文化活动	4	3.70	2	2.90	3	9.09
中日争端	3	2.78	10	14.49	3	9.09
价值理念	0	0.00	2	2.90	1	3.03
领导人个人特写	26	24.07	3	4.35	0	0.00
其他国际关系	0	0.00	2	2.90	0	0.00
各方反应	25	23.15	2	2.90	0	0.00
其他	10	9.26	4	5.80	2	6.06
总计	108	100	69	100	33	100

由表1可以看出,《朝日新闻》对于不同时期、不同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的报道议题存在比较显著的异同。相同点在于,三位领导人访日期间的报道议题均以“领导人会晤、仪式”占首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占报道总量的28.7%、30.43%和30.3%)。这是因为领导人的会晤与仪式是访问事件的核心内容,自然而然成为媒体关注和追逐的焦点。除此之外不同时期的领导人访日报道议题各有特点。

邓小平访日期间的报道,领导人个人特写(24.07%)和各方反应(23.15%)两大议题明显高于江泽民(4.35%和2.9%)和胡锦涛(均为0)访日。为了迎接邓小平访日,《朝日新闻》从1978年10月1日起特地连载名为《长生鸟邓小平》的传记,共计20期,细致地展现了这位中国领导人三起三落的传奇人生经历。正是因为邓小平个人所具有的传奇性和话题性,以及邓小平访日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使《朝日新闻》在议题上更为关注领导人个人和国内外各方反应。

江泽民访日期间,《朝日新闻》的报道议题除了领导人会晤、仪式(30.43%),主要集中在中日关系(17.39%)、两国经济文化合作交流(15.94%)以及中日争端(14.49%)。“两国经济文化合作交流”和“中日关系”议题比例的显著提高,反映出中日建交20多年与中国改革开放对中日两国间经济文化合作交流的促进作用;以“中日争端”为主要议题的报道共有10篇,

此外,其他议题的报道中涉及“中日争端”的还有 24 篇,对于江泽民重提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表态要求,媒体报道反应强烈,除了历史问题,争端话题还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

胡锦涛访日期间,报道议题除了领导人会晤、仪式(30.3%)之外,中日关系(27.27%)和两国经济文化合作交流(15.15%)两大议题延续江泽民访日以来的高比例,这一数据充分体现中日建交 30 多年来两国间经济文化合作交流的日益紧密和两国关系的相互依赖,相应地,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也愈发关注。此外,“领导人社会文化活动”(9.09%)这一议题的比例明显高于邓小平(3.7%)访日和江泽民(2.9%)访日,反映出胡锦涛与日本社会各界人士的来往相对紧密,这一特点与胡锦涛早年从事日本外事接待的经历以及对日相对亲善的政治策略相呼应。“中日争端”的报道议题占 9.09%,日本媒体主要关注的是“饺子事件”。

表 2:《朝日新闻》对于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的立场分布

事件与媒体仪式形态		正面	中立	负面	未提及	总计
邓小平访日	(篇)	53	29	6	20	108
	(百分比)	49.07	26.85	5.56	18.52	100
江泽民访日	(篇)	23	26	10	10	69
	(百分比)	33.33	37.68	14.49	14.49	100
胡锦涛访日	(篇)	12	15	5	1	33
	(百分比)	36.36	45.45	15.15	3.03	100

表 2 是《朝日新闻》对于不同“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的报道立场,显示对于邓小平访日的立场以正面(49.07%)为主,中立立场(26.85%)次之,负面立场的报道明显少于另两者;江泽民访日时期的报道以中立(37.68%)和正面(33.33%)立场为主,两者比例基本持平,前者略多于后者;胡锦涛访日时期的报道以中立立场(45.45%)为主,正面立场(36.36%)报道次之。

由此可以总结,《朝日新闻》对于邓小平访日这一事件构建的媒介图景为:这是两国领导人的友好往来活动,作为中国首位出访日本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访日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江泽民访日的报道中表现的媒介图景是:江泽民对日本的访问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但中方对于历史问题的纠缠使日本社会失望;在胡锦涛访日的报道中表现的媒介图景是:这是一次怀抱着友好心态的“暖春之旅”,但两国在人权、经济和食品生产安全方面的对话还需要更多努力。

三、中国形象:负面报道比例显著增长

在日本媒体涉华报道中,关于中国形象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关注。日本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形象,引导本国民众看待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影响重大。在本研究中,笔者同样将中国形象作为重要的关注点。在 210 篇报道中,通过对新闻文本进行语义判断,将涉及中国国家形象报道根据立场分为正面、中立、负面以及未提及四类,得出相关分布如表 3。

表 3:《朝日新闻》关于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访日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事件与中国形象框架		正面	中立	负面	未提及	总计
邓小平访日	(篇)	14	33	1	60	108
	(百分比)	12.96	30.56	0.93	55.56	100
江泽民访日	(篇)	4	18	5	42	69
	(百分比)	5.80	26.09	7.25	60.87	100
胡锦涛访日	(篇)	2	11	9	11	33
	(百分比)	6.06	33.33	27.27	33.33	100

《朝日新闻》对中国三位国家领导人访日报道的中国形象构建的差异比较明显地体现在负面报道的比例变化上。如表 3 所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朝日新闻》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描述的报道比例有显著的增长。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越来越紧密,中日之间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另一方面,日本媒体对中国形象构建中的负面报道的比例不减反增。

在邓小平访日期间,《朝日新闻》涉及中国国家形象报道主要集中在邓小平的公开言论中,最多论及的是中国四个现代化,立场往往中立。邓小平在公开言论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丝毫不回避中国发展落后的国情,并且表示到日本访问的一大目的就是来学习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经验。

在江泽民访日期间,《朝日新闻》在论及中国时,坦率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成果,并且罗列了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如 1998 年 11 月 25 日二版的评论文章《中国正迈向安定化的道路》。相对地,负面话题主要聚焦于中国的人权,如 1998 年 11 月 25 日的报道《“江泽民主席,请不要忘记人权”——在日中国民主活动家在东京集会》提到了因 1989 年“六四风波”而赴日的相关人士的反应。

在胡锦涛访日期间,《朝日新闻》在论及中国时,数次提到中国目前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国际争端。如 2008 年 5 月 4 日第三版的报道《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多难之时做出访日之举是为大局考虑》中提到欧美各国对中国入权的批判、奥运会圣火传递中的骚乱以及他国首脑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事件使中国的国际关系陷入低谷。在中日之间,引起日本国民对中国产生不和谐感觉的象征性问题是饺子事件。因此,媒体对饺子问题的关注最为密集,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日本,关系到日本国民的食品安全,故 33 篇报道中有 17 篇报道提到了饺子事件。

由此可以总结,《朝日新闻》在邓小平访日的报道中建构的国家形象为:中国是一个蓄势待发的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需求使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在江泽民访日的报道中建构的国家形象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中取得显著成绩,但政治文明有待加强;在胡锦涛访日的报道中建构的国家形象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但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成为中国发展以及周边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四、媒体报道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

通过上述内容分析,《朝日新闻》对于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的报道呈现一定的变化,从邓

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朝日新闻》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描述的报道比例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对于这一现象,本节将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角度来分析其原因。

第一,负面新闻的长期存在与日本报业体制有关。

日本的报纸是伴随着日本西方化的道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成长起来的,深受商业主义和西方新闻理念的影响。虽然《朝日新闻》一直致力于对“客观报道”的追求,但商业主义取向像一根看不见的指挥棒,使得媒体从业人员不自觉地创造利润追求更多“卖点”,而最吸引眼球的往往是富有争议性的内容。同时,日本媒体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极大地受到了西方新闻理念的影响,“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新闻价值取向深入人心。在大多数记者的眼里,没有了冲突、戏剧性和可批评的东西的事件,是缺少新闻价值、不值得大肆报道的。

所以,当涉及中国的报道时,对负面消息与生俱来的热衷,决定了日本大众传媒必然以中日争端等负面内容作为维系“生命线”的新闻。媒体的编辑认为,不负面报道中国就不受欢迎,纷纷把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当作卖点,他们最关心的是“辣味”够不够。^⑤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是立场一向“亲华”的《朝日新闻》,在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时,也不由自主地抛出一些立场偏负面的新闻。

第二,政治力量对日本媒体的渗透和影响,使日本媒体总是跟随政府的外交政策“跳舞”。

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是如此。布尔迪厄曾以新闻场内部的竞争对此做出解释,他指出政治问题上,记者会因外部的影响和内部的竞争而毫无疑问地受到政界人物,尤其是政府负责人具有倾向性的支持;相对地,他们支持政界人物的决策并为其决策进行宣传。^⑥

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可以说是这一论点的现实例证。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在经历了 100 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达到了近 700 个的规模,存在于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各部门、公安机关及各个行业团体之内。虽然新闻协会为了严守报道机关的中立原则和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的使命而强调了组织的自主性,然而实际情况是依赖政府信息发布的记者们无法再跳开政府机构为媒体预设好的报道框架,只能生产出有利于政府的信息和言论。

在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议题时,日本媒体表现出与政府外交政策的一致性。邓小平访日期间,正是中日两国重视睦邻友好关系的“蜜月期”。这是美国、中国、日本在亚洲针对苏联结成统一战线的需要,美国对华持有的友好态度使一向追随美国外交路线的日本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因此尽管当时也存在一些争端,但是日本政府基本上能够以两国的友好大局为重,及时妥善处理问题或避免争端加深。日本媒体顺应当时的“友好外交”的潮流,对华报道比较客观中立,甚至不乏溢美之词。江泽民访日之时,国际形势已发生明显变化,伴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美、中、日合作对抗前苏联转变为美、日联合对抗中国,美国把中国视为潜在“威胁”。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好感减退的情况,日本媒体报道中的负面内容明显增加。

第三,两国国力与国民心态的变化产生的影响。

数据显示,从 1978 年邓小平第一次访日,到 2008 年胡锦涛访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日本内阁府历年外交舆论调查显示:1978 年中日缔结和平条约后,66%的民众认为应该和中国保持紧密关系,42%的民众想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对中国

抱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连续两年上升,最高时达到近 80%。然而到了 1998 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下降至 48.9%，“没有亲近感”的占 47.4%。到 2008 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 31.8%,为历史最低,“没有亲近感的”占 66.6%。^⑦

日本民众的对华亲近感降低与日本媒体中的负面报道是否有直接联系?到底是媒体引导了民意还是民意塑造了媒体?以往研究多认为媒体中的负面报道是“因”,日本民众的对华亲近感降低是“果”。^⑧笔者认为,民意在形成过程中始终受到媒体信息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媒体的呈现也受民意的发展而有所转变,即日本媒体中的负面报道在影响民意的同时也受到日本民意变化的影响。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国际事务中地位越发举足轻重,通过 2008 年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得到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反观日本,经历过 60 年代经济腾飞渐渐显现出后劲不足,经历十年“泡沫经济”的日本金融体系遭受重创,随之陷入缓慢但无可挽回的衰退,巨额的预算赤字和汹涌而至的低息贷款都无法逆转这样的势头。90 年代后日益强大的中国和长期低迷的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个“日本停滞,亚洲成长”的趋势使一向危机意识深重的日本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和不安。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认为,受众在设法减少不协调因素以外,还可以能动地避开那些可能使不协调增加的传播内容,受众一般选择能够支持其信念和价值观的信息,以减轻认知上的不和谐。^⑨他指出,受众对传播内容有认同感时,传播就比较容易地顺利进行。从此角度思考,日本媒体中增多有关中国负面新闻的报道,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中国发展带来的沉重压力,使民众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于是,“媒体以报道中国的非主流黑暗面为己任,似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⑩

五、结 语

本文比较了《朝日新闻》在 1978 年邓小平访日,1998 年江泽民访日,以及 2008 年胡锦涛访日期间的报道框架,并从议题、代表人物、中国形象三个层面展示媒介构建的图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朝日新闻》呈现出负面报道比例持续上升的现象,这一现象可以从日本报业的体制、政治力量对日本媒体的渗透以及更为宏观的两国国力与国民心态变化等角度来考量。

对于中国的学者和国民来说,我们在看待日本媒体涉华报道中的负面新闻时,应该秉持理性的态度。负面报道的产生既有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国民心态等因素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日本国民十分关注的饺子事件客观反映了中国目前在食品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如果通过外来的关注能改善中国国内的食品安全状况,负面报道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除了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消除负面报道的根源,中日两国还需进一步扩大人员交流,只有让日本的国民来到中国,亲身体验关于中国的一切,才有可能消除日本国民对中的误解,增进两国国民的信任,那么,负面报道中有失偏颇的部分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本。

注 释:

^①90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对华政策做出调整,中日进入“政冷经热”的交往状态。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统一

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中日首脑互访一度中断。

②参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中的“中日关系年表”:<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nenpyo.htm>。

③三位领导人访日日期分别为:邓小平访日为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9日、江泽民访日为1998年11月25日至11月30日、胡锦涛访日为2008年5月6日至5月10日;检索日期范围为:邓小平访日1978年9月22日至11月29日、江泽民访日为1998年10月25日至12月30日、胡锦涛访日为2008年4月6日至6月10日

④相关分类参考罗争光:《中美报纸对于“奥巴马访华”报道的新闻框架探析》,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

⑤陈言:《中日政治僵局的民间基因》,《经济》,2005年第5期,第38页。

⑥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2-113页。

⑦参见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www8.cao.go.jp/survey/index-gai.html>。

⑧徐家驹:《日本大众媒体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及其思考》,《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8-22页;王磊:《媒体对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影响——以2008年〈人民日报〉和〈读卖新闻〉为例》,《合肥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55-58页。

⑨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68页。

⑩吴寄南:《中日关系“瓶颈”论》,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王怡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上接第62页)

⑮奥富敬之:《日本人名的历史》,第235页。

⑯同时,第179页。

⑰同上,第176页。

⑱奥富敬之:《名字的历史学》,第184-185页。

⑲奥富敬之:《日本人名的历史》,第176页。

⑳奥富敬之:《名字的历史学》,第185页。

㉑井上史雄:《敬语并不可怕》,大进堂,1999年,第97页。

㉒奥富敬之:《日本人名的历史》,第179页。

㉓黑川伊保子:《日语为何美丽?》,第159页。

㉔同上,第133-134页。

㉕同上,第159页。

㉖同上,第159-160页。

㉗同上,第148页。

㉘同上,第157-158页。

㉙同上,第159页。

㉚同上,第150页。

(吴琼: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讲师 责任编辑:徐静波)

中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及其 国际环境因素比较

康 建

内容提要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得到广泛的共识,但各国采取何种外资政策不仅与本国的发展战略相关,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日本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才实现了本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了不同于日本的开放性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中日两国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与其受到的国际压力、主流经济理论以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变化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日本 中国 国际环境

战后初期至完成资本自由化阶段,日本对外商直接投资基本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这一时期的日本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颇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两国与当时的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明显,亟需实现赶超型发展;另一方面两国又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日两国的赶超都是伴随着引进外资过程实现的,^①不同之处在于,日本采取了以吸收间接外商投资为主、技术引进为核心的保护主义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因此,当日本实现经济赶超后,并未出现外资垄断日本市场的现象。反观中国,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

由于日本在传统上主要是一个对外投资国,对日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外投资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日本对内直接投资进行研究的不足。国内关于日本战后经济的教科书一般忽略或者极少涉及外商对日直接投资,而且往往是作为日本资本形成的一部分进行介绍。^②早在1997年,就有学者担心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后可能带来的冲击,因而注重分析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③对外商对日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在直接投资骤增之后,并将重点放在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日本的原因及其在完善法律制度、促进中介服务机构建设、规范外资并购等方面对中国的启示。对于国际环境对中日两国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影响,上述研究并未深入分析。^④

一、中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比较

日本对外资开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⑤但由于其采取的谨慎态度,在战后初期至资本自由化完成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在日本的规模及增速都很小。在此期间,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保护主义特征。其中,初期对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采取严格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并经历了被动的资本自由化。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采取了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的战略,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则体现出保护

本国产业的政策。195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外资法》,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引进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技术引进等挂钩,并且规定外资在合资企业中的比例上限。除此之外,具体的行政审批也带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质。因此,政府实际上对直接投资的规制要比单纯的法律明文规定要严格得多。资本自由化之前进入日本的外资主要是以间接投资,即外国借款为主,这就更加增强了日本政府对外资进行干预的自主性:可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划对间接投资进行划拨,大力发展指定的重点产业。

日本的外资自由化进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经过5次渐进式开放,于1973实现了全面的资本自由化。^⑥外资自由化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加入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缘故。经过50年代的保护性发展,日本在某些生产部门已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和一定的承受外资冲击的能力,但其他一些“幼稚工业”仍然国际竞争力不足。因此,伴随着资本自由化过程的是担心日本被外国人“兼并”的忧虑。1967年,“外国投资审议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资本自由化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其中就包括国内公司或工业有可能被拥有更高技术和更多资金的外国公司所统治。在整个资本自由化期间,日本政府在策略上采取消极的、渐进式的自由化措施,^⑦而在战略上则采取积极的对策,包括产业体制改革、强化技术制胜、完善流通机制等。^⑧

在部分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可以视为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先驱。^⑨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表现出与日本政府的极大不同,中国政府并未对除国有企业之外的内资企业进行保护。相反,恰恰是中国政府的不公平政策所导致的本地企业存在的问题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大量进入中国:直到20世纪末,中国的私有企业在法律、财政、市场准入等方面都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私企寻求与外资合作,不仅能够找到资金及市场等方面的出口,也使得其私有财产得到保护;私有企业兼并国企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这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缺少竞争的投资环境下更具有投资机会和“讨价还价”的优势。^⑩

表1 实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流入量(1979-2006)

单位:10亿美元

年份	流入	年份	流入	年份	流入	年份	流入
1979	1.17	1986	1.87	1993	27.5	2000	40.7
1980		1987	2.31	1994	33.8	2001	46.9
1981		1988	3.19	1995	37.5	2002	52.7
1982		1989	3.39	1996	41.7	2003	53.5
1983	0.64	1990	3.49	1997	45.3	2004	60.6
1984	1.26	1991	4.37	1998	45.5	2005	60.3
1985	1.66	1992	11.0	1999	40.3	2006	63.0

资料来源:张鹏:《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3-74页。

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存在的巨大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广阔的潜在市场。同时,中国政府给予外商极大支持:与日本严格限制外资持股的做法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中规定了外资的下限,即“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除此之外,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还享有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仅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经营期十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将拥有“二免三减

半”的优惠,先进技术企业享受“二免六减半”的税收优惠。^⑩中国政府还设立了经济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专门服务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特殊区域。在这些综合因素的推动下,外资进入中国后就经历了不断的增长,以 1992 年为节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2 年之前吸引外资的效果比较平缓,自 1992 年开始对华直接投资出现大幅度增长(表 1)。

二、中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

贸易自由化之后,日本企业仍然拥有低工资这一有利条件,竞争力较强。但当资本自由化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将与本国企业共享这一优势,这对于日本而言是不利的。因此,资本自由化压力下的日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日本在国际压力下充分利用国际协定中的“缓冲期”条款,分阶段进行资本自由化,通过保护“幼稚产业”,阻止了外资对日本的垄断。反观中国,不仅给予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而且不公平的内资企业政策更加增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带来冲击。中日两国政府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政策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度不同

战后初期政府对外资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导致进入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少,1950 年到 1965 年间,对日直接投资的累计额只有 2.7 亿美元,^⑪直接投资在产业资金供给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很低,1959 年、1962 年、1965 年分别只占 4.3%、2.9%和 1%。^⑫同样,在资本自由化过程中,日本政府仍对原有企业的外资进入附带种种条件,并规定了 5 个例外行业(农林水、矿业、石油、皮革及其制品、零售业等)。外资少量进入日本,使其对外资的依赖度很低(表 2),发展所需的资金基本上是靠内资来完成的。

表 2 外资依赖度(外资纯输入与国内总资本形成的比率)

期间	外资依赖度(%)
1952—1960	-0.1
1961—1970	-0.2
1971—1980	-1.5

资料来源: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毕志恒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 年,第 142 页。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其比重占流入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⑬无论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产生总之(GDP)总量的百分比、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资本形成中的比例来看,中国都对外资存在着高度依赖。^⑭以 1992 年为例,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国内投资中的比重仅为 3.2%,韩国和印度相应的份额则少于 1%,而中国却高达 25%。^⑮

(二)外资与中日“世界工厂”

70 年代初,日本完成了从轻工业为主向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升级。商用车、收音机、电视机等许多工业品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并营销世界各地,日本已成为继英、美之后的又一个“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少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保护主义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指导下,外国跨国公司通过契约合同(大多数是特许合同和转包合同)提供新的或

先进的技术,提高了日本制造业的整体水平。

90年代之后,随着制造业出口的不断增长,中国也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外资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对华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在1997年至2005年间,除1998、1999两年略低于70%以外,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的比重都高于70%,并接近75%。^①以加工贸易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商投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加工贸易的绝对主力: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64%,2006年已达85%。^②但出口产品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不高的初级制造业,庞大的出口对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造成了冲击,贸易摩擦不断出现。

(三)技术引进效果不一

在日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技术引进处于核心位置。可以说,正是技术引进的需要才使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必要。为了防止国内企业在引进技术上的盲目竞争,日本政府采取了“技术引进窗口企业”的办法,在战略产业各部门中采取“寡占”,即扶植两到三家核心企业,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垄断,还能起到规模化、组织化的效应。同时,引进的技术内容随着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而不断更新:50年代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部门,以革新性技术设备为主;60年代前半期除了继续引进大型成套生产设备之外,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引进剧增,后半期主要是引进消费流通业关联技术及二、三次加工技术。日本凭借着政府政策支持下的技术引进,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赶超。

而中国欲通过引进外资带来先进技术这一初衷却大打折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集中于低端加工制造业。按照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01年底,在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中,70.3%属于劳动力寻找型投资。^③中国所从事的部分加工贸易产品虽然属于技术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但在中国所完成的加工或装配工序却完全是劳动密集型活动。外资大规模充斥在处于技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不高。通过对1998-2003年37个工业行业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杜健等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技术边缘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行业的技术边缘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④另外,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根据来源地的不同而不同,技术溢出较强的是香港、澳门、台湾等“海外中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但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这类公司的投资却同样集中在低技术领域。^⑤

三、两国采取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国际环境因素

在由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两者存在着互动关系。国际体系在通过市场和政治压力约束国家选择的同时,国家保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日本的明治维新靠的是欧美国家逼日本开放的“外力”,战后改革靠的是美国占领的“外力”。但最可贵的是,日本往往能够将国际压力转化为动力,在顶住国际压力的同时,维护自主地位,按照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进行规划。战后资本自由化不仅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而且彼时的国际环境也利于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当中国对外资开放的时候,国际环境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从全球化的钟摆式变动、全球经济的周期性规律等角度可以解释两国面临的不同国际环境,但这种解释未免过于宽泛。

(一)国际压力的变化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面临着日本发展过程中未曾遇到的压力。由于冷战的特殊环境,日本享受到了与美国结盟所带来的巨大收益。作为日本最大的借款提供者和贷款债权人,美国不仅在资金上全力支持日本,还出于盟友关系情愿暂时放弃贸易关系中的完全互惠原则,^②“善意忽略”日本的保护主义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默认日本政府期望美国在日外商直接投资最小化的愿望。^③只有当日本的快速发展对其造成了伤害,两国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之时,美国才开始要求日本实行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但此时的日本,早已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可见,早期美国默认下的日本对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政策对于日本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而当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这种环境早已不存在。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凭借其“结构性权力”塑造世界的底气大增,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尤其是中俄等国必须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从而实现“历史的终结”。虽然美国超强的实力及联盟机制是确保其霸权地位不受挑战的重要手段,但作为“霸权之翼”^④——由欧美等发达国家创立、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机制同样重要。美国不仅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上的防范,还试图将中国纳入其领导之下的国际经济制度以求达到“同化”的目的。这种“同化”属于强制性的政策融合,即更多地反映了施压方的政策偏好,受压方的政策自律性则相对较低,其最大特征在于双方政策调整的非对称性。^⑤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既然中国决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又不具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实力,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满足发达国家的开放要求。

冷战时代,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两强紧张对立时期,生存是第一位的国家目标。为了服从争霸的需要,美国需要日本的支持,而此时也是日本实现赶超的重要时刻,因此,美国从大局出发,可以默认日本在资本自由化问题上的保护主义。而当中国改革开放、外资开始于1992年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两极格局已成历史,国家生存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相比已然下降,国家经济安全的地位开始上升,这在克林顿政府“三大支柱”战略中可以体现出来。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更大的利益,美国要求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压力不断加大。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如美日关系一般。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早已是各国的共识。冷战时期,虽然日本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但仍然能从先进国家引进经过严格审批且符合自身需求的技术,从而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据统计,1960—1971年间,日本总计引进甲种技术8841件,乙种简单技术5837件。^⑥而改革开放之后,发达国家不仅对中国进行先进技术封锁,还限制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输出。

(二)主流经济理论的不同

战后日本对外资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是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所能容忍的。战后的主流经济理论是在大萧条和战时逐渐形成的,是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的经济国家主义;扬弃了自大卫·李嘉图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比较优势理论,确立了以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理念。虽然美国领导建立了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但这不能消除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给各国带来的互不信任。当时“进口替代”战略是亚太各个国家和地区一致的发展战略。原日本通产省外资课长藤原一郎对限制外资解释道:“作为国家,对引进外资完全自由放任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对该国的经济产生明显不良影响时,应该予以制止,应采取扬长避

短的政策。这个意图不靠政府的直接统制也能实现,那就是实行 50%主义。”^②

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完善了其实力理论,“软实力”成为美国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通过鼓吹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要求开放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冷战后主流经济学家眼中,保护主义是罪恶的,试图创立以英美等国“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普世的自由经济理论,这一方面是相关学者受到个人野心的驱使,因为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宏观的、普适的经济理论,那将是对其学术地位、个人价值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确定的、主导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激励。^③这种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抽象的和推论式的研究方法,其基本理念包含在“华盛顿共识”之中。这是英美等国在占据世界领导地位之后,为了自身的继续发展所大肆宣扬的世界经济发展理论。这必然会导致英美等国掩盖自身的真实发展道路,从而让后发国家接受其极力宣扬、但却从未真正使用过、也并非真正适合后发国家发展的“好”政策和“好”制度。中国在 90 年代后期实行的前所未有的开放规模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在海外接受过训练的经济学者大力提倡中国经济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④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证明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并不成功,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则似乎证实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直接投资会比有价证券投资更加稳定。这些都对中国采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转变

日本之所以能够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之时,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这就迫使各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终端产品来参与国际贸易。战后几十年日本产业结构具有“全面配套型”的特征,即什么都靠自己制造的“全面配套主义”结构,也可以说是推行一种产业“无空洞化”的路线。^⑤而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国际分工的基础变成了以生产要素为主,其中跨国公司为国际分工的深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两者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态度恰好是因为各自处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阶段。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有的学者将跨国公司投资类型概括为资源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技能、管理和营销技巧等)、市场型、效率型和战略型。^⑥也有的学者以东道国市场规模为标准,概括为市场型、效率型和出口平台型。^⑦不管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如何进行划分,重要的是作为商业组织,跨国公司的终极目的在于“利益最大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世界生产体系,跨国公司必然会寻找成本最小化的生产基地。

当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时候,贸易壁垒的存在会促使跨国公司到东道国进行投资,以绕开贸易壁垒,占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这是属于市场型对外直接投资。在日本贸易自由化之后,由于关税及运费的存在,外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优势也并不明显。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发展不受冲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终端产品,日本政府只能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保护主义的态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市场逐步扩大,跨国公司要充分利用各国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不仅仅将目标市场瞄准东道国,而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跨国公司可以将各个生产

环节分解,并作为整个生产环节的一部分,在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从事加工或装配,力求实现最大的价值增值。这种直接投资属于出口型或降低成本型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制造、出口基地而已。中国改革开放后,恰逢日本及“四小龙”企业和跨国公司进行产业转移,其对华进行直接投资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把中国作为产品的加工、组装及出口基地。

四、结 论

通过论述中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政策及其对两国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看出,渐进式的保护主义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是有效的。尽管主流经济理论总是强调自由竞争最具效率,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总是在开发和保护之间寻求平衡。^③当然,采取何种外资政策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在提倡自由竞争、反对保护主义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国际环境中会使相关国家受到很大的压力。因此,如何顶住国际压力,发挥本国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早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之初,就有声音提醒中国要充分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反效应。^④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已走过了30多个年头,虽然这一过程不能逆转,但相信日本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政策和经验会给予今后的中国以很大的启示。

注 释:

①渐进式保护主义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是其进入日本的重大障碍。虽然进入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很小,但日本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的有效制约使其基本上按照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为数很少的外资企业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见崔健等:《简析日本对外资企业的有效制约》,《现代日本经济》,2000年,第6期。

②最为详细介绍对日直接投资的当属朱立南:《战后日本的对外开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③杨栋梁:《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24、25章。

④有学者从全球化的钟摆式变动、全球经济的周期性规律的角度分析中日不同外资政策,见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言。

⑤徐梅:《外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分析》,《日本学刊》,2005年第5期,第51页。早在1899年,日本就修改了《商法》,开始允许外国企业以合资的方式在日本设立子公司。虽然当时日本不存在完整关税主权,但与同时期的清朝相比,在外资政策上的自主性仍然很大。

⑥只能算是原则上完成了资本自由化,因为限期完成自由化的17个行业,如集成电路、信息处理产业、精密仪器等,直到1976年才陆续完成自由化,制造业直到80年代才基本达到发达国家的自由化程度。见张季凤:《日本引进外资新动向——如何看待日本引进外资首次超过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国际贸易》,2005年第8期,第32页。

⑦Masako Sugino-hara,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Japan: Backlash against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ian Studies*, Vol. 48, No. 5 (September/ October 2008), pp.842-844.

⑧阎莉:《入关后日本资本自由化的对策取向》,《日本研究》2004年第1期。

⑨高柏著:《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第14页。

⑩Yasheng Hua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N. Ghosh, “FDI and Reform: Significance and Relevance of Chinese Experi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0, No. 51 (Dec. 17-23, 2005), pp.5388-5391; Murali Patibandl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7, No. 47 (Nov. 23–29, 2002), p.4695.

⑪“两年三减半”指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到第五年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8条；“两年六减半”指先进技术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可以延长三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第9条；此外，经济特区、开发区的外企以及出口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值70%以上的外企可享受更大的优惠，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第8条。

⑫刘鉴如等主编：《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之谜》，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202页。

⑬张贤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⑭Andrew Sumner,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ood for the Poor? A Review and Stocktake,”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15, No. 3/4 (Jun., 2005), p.271.

⑮Yasheng Hua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pp. 6–14.

⑯Bishwanath Goldar, et 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4, No.22(May 29–Jun. 4, 1999), p.50.

⑰张鹏：《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⑱同上，第168页。

⑲宋泓等：《以劳动力寻找型为主——我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性质分析》，《国际贸易》，2002年第10期，第53页。

⑳杜健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技术边缘化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0期。

㉑Peter J. Buckley, et al,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ward FDI and Spillover Effects Linea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ase of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38, No.3(May, 2007), pp.447–459; Peter Nolan, et al, “China’s Economy on the Eve of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Dec., 1995), p.988.

㉒约瑟夫·格里科等：《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王展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㉓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Autumn, 1998), p.832.

㉔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㉕贺平：《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外压与政策协调》，《日本学刊》，2011年第3期，第76页。

㉖李萍：《战后日本产业技术政策的特点和成果》，《经济导刊》，2008年第7期，第30页。

㉗杨栋梁：《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362页。

㉘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㉙郝雨凡：《中国对外经济政策50年》，《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第60页。

㉚冯昭奎：《“世界工厂”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新世纪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动态》，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㉛宋泓等：《以劳动力寻找型为主——我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性质分析》，第48–49页。

㉜张鹏：《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研究》，第66页。

㉝张蕴岭主编：《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㉞Victor F. S. Sit, “China’s Export-Oriented Open Areas: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Concept,” *Asian Survey*, Vol. 28, No. 6 (Jun., 1988), p.675.

(康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浩川)

对中国大学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材与 日本中小学国语教材的比较研究

——内容异同所体现的现代性课题

田中祐辅

内容提要 日本国语教育在当今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论文旨在比较研究中国大学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材与日本中小学国语教材的,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间出现的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育中的日本国语教育课题的现状及其现代性课题加以考察。在把握两者内容近似性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今后日语教育的目标,并为此构筑和发展新的学科建设。

关键词 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育 基础阶段 日语教材 日本国语教材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中国日语学习者增长趋势显著,总数达到约83万人,参加日语能力考试的中国考生也在日本国外考生总人数中排名第一。其中,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日语的人数尤多,约占中国日语学习者总数的7成,约合全球高等教育机构中日语学习者总数的6成。^①

中国的日语教育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即小规模展开,至70年代初规模显著扩大,全国各地的大学相继开设日语专业,形成了“第一次日语学习高潮”。^②最初,日语教师主要来自归国华侨、战后日本遗孤及战前在旧殖民地高等教育机构受过教育的人。至70年代末,又有数十名日本高中国语课教师作为日语母语教师被派往中国。^③当时日语教育界争论的课题之一是“日语作为第二语言,其教学与日本本国的国语教育不同,由日本高中国语课教师等以日本国语教育的内容及手法进行教学存在问题”(以下,简称“日本国语教育课题”)。例如,有观点认为,归国华侨教师“在语言能力尤其会话能力上虽无争议,却明显不具备日本学、日语学的素养与经验,因而未必能胜任中日比较研究,需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④更有人认为“这并非教日本人国语,而是教中国人日语,从日本派来众多高中国语课教师也自然不妥。”由此,以“国语”的形式习得日语的归国华侨、日本在华遗孤、受过战前旧殖民地高等教育者、日本高中国语课教师或是以日本国语教育为专长的人教授中国人“日语”被认为并不合适。森田良行指出,尽管在与日本的县教育委员会的合作下^⑤,中国接收日本高中国语课教师的项目步入了正轨,但因日本国语教育与中国日语教育本身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相去甚远,故该项目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下实际并不太受欢迎。^⑥据80年代后期经由日本县教育委员会前往中国的一位日本高中国语课男教师所述,尽管当时这批教师使用日本高中的

国语教材授业在日语专业 3、4 年级的教学中相当普遍，但时常会出现诸如教材的内容不迎合学生兴趣，或是无法帮助学生补充必要信息等问题。

到了 90 年代，中国国内兴起了有关日语教育中语法教学的争论。针对当时中国的日语教育，李红旗指出，日语教师惯用的语法教学方法能够适应的是既有的日本国语教育，但随着适应中国日语教育的语法教学的兴起，原有的教师队伍却显得有些茫然失措。经过对中国日语教育与日本国语教育在对象、目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研究，李红旗认为，中国应当积极采用针对日语教育的语法教学。^⑦

二、问题所在

90 年代之后，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在质量和数量上均有所进步。从数量上看，教师人数从 1979 年日本国语教育课题争论伊始的 1139 名激增至 2009 年的 15613 名（其中中国籍教师 13134 名、日籍教师 2479 名），居 125 个国家、3 个地区之首，比例约达 31.3%。^⑧这些教师中大部分来自日语本科专业，也有一些则曾在中国日语教师进修班等专业机构、专科学校等进修日语。自 2001 年日本开设首个日语教育专业硕士课程（其后博士课程也得以开设）以培养具有更高专业素质的人才以来，从日本研究生院的日语教育专业毕业归国任教的人员大量增多。同时在来华的日语母语教师中，也有许多人毕业于本科或研究生院的日语教育专业，具有丰富的日语教育经验。从质的方面来看，随着《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大纲》^⑨的制定与实施，相对应的教学计划、课程设计以及教材研发也取得长足发展。

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在“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科建设的加强和学士—硕士—博士人才培养层次的完善……教材开发和研究的水平”^⑩等方面确实有了质的提高，但在此过程中当初曾被广泛议论的“日本国语教育课题”却销声匿迹。为此，有关当今中国日语教育的内容、手法与日本国语教育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这一课题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论证。目前与该课题最为相关的研究来自篠崎摄子发表于 2006 年的论文，^⑪该文对中国大学日语专业基础阶段（1、2 年级）的 4 套综合日语（精读）^⑫教材共计 16 册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并指出：（1）基础阶段教材的第 1、2 册以编者原创的文章和会话为主，原因在于按教学进度依次引入教学项目时便于调整；（2）第 3、4 册的内容则经由日本出版的针对外国人的日语教材、日本的国语教材中的文章逐渐过渡到了日本人平时阅读的现成文章。由于该研究着重于通过与日本国语教材的比较指出中国日语教材的特征，考察今后综合日语（精读）教材的形式，因而对中日两国的教材在内容上具体有多大程度的重合或重合部分有何特征等问题尚未涉及。此外彭广陆通过分析 4 套基础阶段综合日语（精读）教材内容也证实，90 年代起针对日语教育的语法教学一说虽受到关注但实际却并未普及。^⑬

究竟中国日语教育界的日本国语教育课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本研究将关注以往研究中未及具体考证的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材与日本国语教材的异同点，阐明两者具体的重合度及其特征，重新审视日本国语教育课题。这对正确把握中国日语教育的现状以及探讨今后的发展方向不无助益。

三、研究目的与方法

围绕 70 年代末至 80 年中国日语教育界所争论的日本国语教育课题, 本研究的目的即在于论证当今中国日语教育的内容、手法与日本国语教育间存在的关联性, 把握并考察中国日语教育的现状这一现代性课题。

基于“日语教育与日本国语教育在教育目标、指导内容上各有差异, 这种差异也反映在教材中”^⑥这一立场, 本研究以教材为调查对象, 对北京、上海、大连三地大学普遍采用的综合日语(精读)这一日语专业课时最多的主干学科的 5 套共 20 册教材^⑤(表 1)的内容(19 项发音指导、346 则会话、429 篇文章、119 名文章作者)与日本中小学国语教材^⑥的内容进行比较调查。日本中小学国语教材中的文章作品参照了日外联合社(日外 Associates)2008 年编写以及阿武泉 2004 年编写的战后中小学国语教材刊登作品数据库。^⑦

表 1 综合日语(精读)基础阶段用日语教材一览

	教材名	编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使用地区
T1	《基础日语教程》1	朱春跃、彭广陆 主编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北京
T2	《基础日语教程》2			1998 年第 1 版	
T3	《基础日语教程》3			2000 年第 1 版	
T4	《基础日语教程》4			2001 年第 1 版	
T5	《综合日语》1	彭广陆、守屋三 千代总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2 版	北京
T6	《综合日语》2			2010 年第 2 版	
T7	《综合日语》3			2010 年第 2 版	
T8	《综合日语》4			2006 年第 1 版	
T9	《新编日语(修订版)》1	周平、陈小芬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	上海
T10	《新编日语(修订版)》2			2010 年第 1 版	
T11	《新编日语(修订版)》3			2008 年第 1 版	
T12	《新编日语(修订版)》4			2008 年第 1 版	
T13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1	孙宗光等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	上海
T14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2			2005 年第 1 版	
T15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3			2005 年第 1 版	
T16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4			2005 年第 1 版	
T17	《新大学日本语》1	蔡全胜等主编	大连理工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第 2 版	大连
T18	《新大学日本语》2			2007 年第 2 版	
T19	《新大学日本语》3			2007 年第 2 版	
T20	《新大学日本语》4			2007 年第 2 版	

对于教材的“内容”, 本研究重点关注在教材“正文”、“应用文”、“阅读”(根据教材中的分类)各部分中所引用的文章作品, 并通过下述两点进行比较。(1)中国日语教材“正文”、“应用文”、“阅读”部分中的引用作品与日本国语教材中作品是否一致。(2)引用作品的作者与日本国语教材中作品的作者是否一致。基于调查结果, 分析决定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育目标和内容的《教学大纲》与各教材的前言表述, 并针对教材使用人群(教师、学生)进行访问调查。

四、研究结果

首先,中国日语教材“正文”、“应用文”、“阅读”部分中,教材编者原创作品数与引用作品数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2 中国日语教材“正文”、“应用文”、“阅读”部分整体的原创文章与引用文章的比率

	教材名	原创文章比率	引用文章比率
T1	《基础日语教程》1	100%(10/10)	0%(0/10)
T2	《基础日语教程》2	100%(15/15)	0%(0/15)
T3	《基础日语教程》3	100%(15/15)	0%(0/15)
T4	《基础日语教程》4	0%(0/15)	100%(15/15)
T5	《综合日语》1	100%(11/11)	0%(0/11)
T6	《综合日语》2	100%(15/15)	0%(0/15)
T7	《综合日语》3	46.7%(7/15)	53.3%(8/15)
T8	《综合日语》4	20%(2/10)	80%(8/10)
T9	《新编日语(修订版)》1	100%(34/34)	0%(0/34)
T10	《新编日语(修订版)》2	100%(40/40)	0%(0/40)
T11	《新编日语(修订版)》3	50%(20/40)	50%(20/40)
T12	《新编日语(修订版)》4	58.3%(21/36)	41.7%(15/36)
T13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1	100%(21/21)	0%(0/21)
T14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2	100%(21/21)	0%(0/21)
T15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3	38.1%(8/21)	61.9%(13/21)
T16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4	14.3%(3/21)	83.7%(18/21)
T17	《新大学日本语》1	100%(15/15)	0%(0/15)
T18	《新大学日本语》2	100%(19/19)	0%(0/19)
T19	《新大学日本语》3	29.4%(5/17)	70.6%(12/17)
T20	《新大学日本语》4	10.5%(4/38)	89.5%(34/38)

所有5套教材的第1册至第2册(T1、T2、T3、T5、T6、T9、T10、T13、T14、T17、T18)都只有编著者的原创文章,其中《基础日语教程》系列(T1~T4)的第1、2、3册(T1、T2、T3)全部为原创文章。

其次,表3显示了在中国日语教材“正文”“应用文”“阅读”各部分的引用作品中,与日本国语教材中作品相一致的文章占引用作品总数的比例,以及被引用作品的作者与日本国语教材中被引用作品的作者相一致时其在引用作品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表 3 综合日语(精读)基础阶段日语教材作品、作者与日本国语教材的重合比率¹⁹⁾

	教材名	引用文章作品重合比率	引用文章作者重合比率
T1	《基础日语教程》1	/	/
T2	《基础日语教程》2	/	/
T3	《基础日语教程》3	/	/
T4	《基础日语教程》4	20%(3/15)	53.3%(8/15)
T5	《综合日语》1	/	/
T6	《综合日语》2	/	/
T7	《综合日语》3	12.5%(1/8)	50%(4/8)
T8	《综合日语》4	0%(0/8)	25%(2/8)
T9	《新编日语(修订版)》1	/	/
T10	《新编日语(修订版)》2	/	/
T11	《新编日语(修订版)》3	30%(6/20)	50%(10/20)
T12	《新编日语(修订版)》4	20%(3/15)	26.7%(4/15)
T13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1	/	/
T14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2	/	/
T15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3	23.1%(3/13)	76.9%(10/13)
T16	《新编基础日语(修订版)》4	44.4%(8/18)	88.9%(16/18)
T17	《新大学日本语》1	/	/
T18	《新大学日本语》2	/	/
T19	《新大学日本语》3	83.3%(10/12)	91.7%(11/12)
T20	《新大学日本语》4	85.3%(29/34)	88.2%(30/34)

中国日语教材“正文”、“应用文”、“阅读”部分中的引用作品与日本国语教材中作品重合比率最高的教材为 T20, 所引作品的 85.3% 与日本国语教材中作品一致。全部 20 册日语教材中, 有引用作品的共 9 册(T4、T7、T8、T11、T12、T15、T16、T19、T20), 其中的 8 册(T4、T7、T11、T12、T15、T16、T19、T20) 与日本国语教材的重合率分别为 20%、12.5%、30%、20%、23.1%、44.4%、83.3%、85.3%。引用作品的一致程度最低的是 T8, 无重合。有引用作品的 9 册中有 4 册(T4、T7、T8、T12) 重合率低于 20%。除了在调查对象中最突出的 T19、T20 的重合率超过 80% 以外, 其余对象的重合率均不足 50%。对于相重合的引用作品, 笔者进一步调查了它们在日本各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国语教材中出现的比例, 结果如图 1 所示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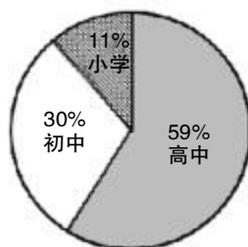


图 1

所有重合的作品中,中国日语教材与日本高中国语教材重合最多,达到 59%。其次是初中教材,重合率达 30%,与小学教材重合的引用作品只占 11%。

关于引用作品的作者与日本国语教材中作品的作者是否一致的问题,一致程度最高的中国日语教材达到了 91.7%(T19)的比率,重合率超过 50%的日语教材有 7 册(T4、T7、T11、T15、T16、T19、T20)。反之,重合程度最低的日语教材(T8)仅达 25%,另有 2 册(T8、T12)的重合率在 30%以下。

作品的重合比率与相应日语教材的情况如图 2 所示,作家的重合比率与相应日语教材的情况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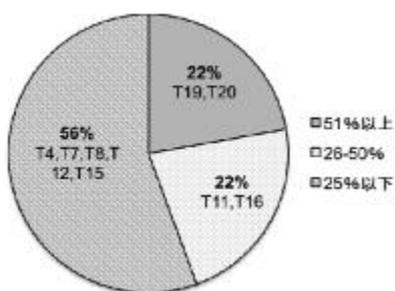


图 2 作品重合比率与对应日语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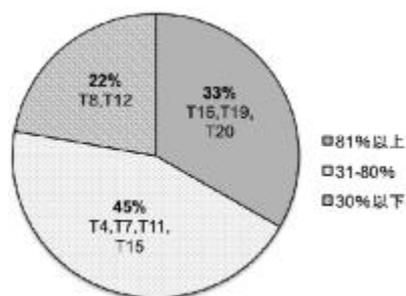


图 3 作家重合比率与对应日语教材

其中,基础阶段教材所引用的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是石森延男,其他作者、引用教材、被引用的作品如表 4 所记。

表 4 被日语教材多次引用作品的作者与作品名²⁰

作者名(出现次数)	对应教材	作品名
石森延男(7)	T11、T12	切手の話、記念写真、マラソン戦争、お金の話、テレビを活用しよう、福沢諭吉、頼む言い方と勧める言い方
荒井礼子(5)	T12	上海を訪れる、忙しい毎日、日本人の人間関係、地球の自然を守ろう
汤川秀树(4)	T19、T20	認識するということ、創造性の尊重、自己発見、自己発見(続き)
小林秀雄(3)	T20	美を求める心、読書について、読書について(続き)
宫泽贤治(3)	T20	どんぐりと山猫、どんぐりと山猫(続き)、永訣の朝
向田邦子(3)	T16、T20	字のない葉書、コロブスの卵
福島正実(3)	T11	テレビ電話、二十一世紀の食事、地球は狭くなった——未来世界の話
渡边实(2)	T4、T20	外来語と日本文化、言葉の意味
加贺乙彦(2)	T15、T16	音楽公害、夜空を見上げての嘆き
井上靖(2)	T20	好きな言葉、人間を信ずるとということ

五、考 察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北京、上海、大连)所使用的几种主流基础阶段教材的第1、2册无引用作品,所有课文均系编者原创。有学者已指出日语专业基础阶段前期使用的综合日语(精读)教材第1、2册以编者原创的学习用文章与会话为中心,本研究则更详细地揭示了这一实际情况。^①此外,筱崎摄子的研究已经指出基础阶段后期使用的综合日语(精读)教材第3、4册的内容结构从日本出版的针对外国人的日语教材、日本的国语教材中的文章逐渐转向日本人平时阅读的现成文章,而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探明了精读教材的文章与日本国语教材中作品的一致程度。

此次关于综合日语基础阶段教材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中国大学日语专业基础阶段的状况,这与笔者此前研究的高年级阶段的状况明显不同。^②在后者的研究中,综合日语高年级阶段教材(在北京、上海、大连三地的大学广泛使用的教材,共计17册)的内容(339篇作品、256名作者)与日本高中国语教材的内容^③的比较调查的结果显示,在高年级阶段,“正文”、“课外阅读”、“阅读”、“补充教材”等部分的引用作品与日本高中国语教材中作品一致度最高的日语教材的重合率达到88%,17册中有12册的重合率在50%以上。作者重合率最高的教材达到100%,且17册的重合率均在50%以上。被引用的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为司马辽太郎、山崎正和、森本哲郎与金田一春彦。可见,尽管基础阶段与高年级阶段的综合日语(精读)教材均有课文与日本国语教材中的作品相同,但基础阶段的作品重合率远不如高年级阶段高。

究竟为何会产生如此差异?针对上述有关基础阶段综合日语(精读)的调查结果,本研究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察:规定中国大学日语专业的教育目标与内容的《教学大纲》、日语教材的前言、对4名在中国从事日语教育并拥有教材编写经验的教师所进行的采访以及对教材使用者的问卷调查。^④

1. 基础阶段日语教材引用日本国语教材所用课文的理由

根据面谈采访的结果,教师A、B、C、D一致认为日语专业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专业的日语表达能力及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并分别给出以下回答。“日语专业不同于一般的日语培训机构,须对学生进行更高知识层面的教育。许多中国的日语教学专家认为,从内容上说,采用日本高中生使用的国语教材的课文是最有效的途径(D)”；“使用日本国语教材能学到比较纯正的日语,课文中使用的日语比较自然、地道(A)”；“若要培养像日本人一样的日语专家就应使用日本国语教材,这无可厚非。国语教材的课文是从大量作品中精选出的,所以从这些课文中挑选文章作品应当最合适(C)”。正如田中(2011)所指出的,既然是日语专业,目的自然是为了培养能流利使用“与日本人相同的日语”的专业人才,故学习日本国语教材上的内容较为妥当,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原本内容上就已经经过仔细筛选的日本国语教材中进一步选取文章是较为合理的。此外,“中国大学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教育重点不仅仅只是日语能力,还包括日本研究。教育的目标尤其着重于培养具有高人文素质(文学素养)的人才。为此,目前的教育现状是,中级之后的日语教育逐步偏向阅读理解,所用材料有很多是日本高中教材中选用的文学作品(D)”,此类观点认为要具备从事日本研究的素养,有必要学习日本国语教材上的内容。那么如何获得所需的日本国语教材呢?针对此问,笔者得到如下回答:从来华任教1至2年的日本人教师所留下的教具或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各类财团、各大合作交流院校向中国大学的阅览室、图书馆捐赠的书籍中寻找(A、C)。问题在于,捐赠书

籍中一些日本出版的日语教材(《大家的日本语》等)对日语专业的教学来说过于简单(词汇量太小,与鼓励练习大量单词、语法来掌握基础的日语专业师生的理念不符),因而无法实际使用(A、B、C、D)。

在《教学大纲》中,对基础阶段综合日语(精读)课程规定“要注重实践性,要以学校、家庭、社会等题材为主,适当选编包括日本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以及科普常识方面的文章”^⑤,而对高年级课程则规定“使学生不仅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还应有广泛且具有一定深度的关于日语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⑥。教师D在援引上述大纲内容的同时认为,“日语教育的前提是‘交流’,但日语专业的教育也是以培养具有高度‘语言学、文学’知识的专业人才为目标的教育,而综合日语(精读)是日语专业的主干科目。尽管日本的国语教育确实不利于‘输出式’训练,但内容上与中国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符,所以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育不能仅停留在‘交流’的目标上,而应把眼光放到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的高质量教育上。”原本中国日语教育与日本国语教育的目的各异,但为了达成日语专业教育追求的“专业性培养”的目标就要求更高层次的日语、日本文学知识,故而有观点认为学习日本国语教育的内容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据笔者与共同研究者一起实施的针对使用教材的日语学习者的问卷调查结果,^⑦学习者学习日语的第一目标在于掌握与日本人交流的必要能力,其中学习“正确的日语”以及对日本社会背景、日本人的思考方式与生活等方面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从理想的教材中应当能学到“正确的日语”以及“日本文化、历史”、“日本人的思考方式”。这尽管与《教学大纲》的主旨以及教师的理念相契合,但问卷结果表明,不少学习者感到已有的综合日语(精读)教材的内容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合或认为无法从中及时获取有关当代日本、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生活中最常用的语言等鲜活的信息。

可以说,之所以基础阶段日语教材会引用国语教材中出现的作品,其主要原因是为了使学生掌握和理解“正确的日语表达”、“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心理”等,这一目标是《教学大纲》、教师、学习者之间的共识,同时在编写教材时,参考日本国语教材被视为既合适又高效的途径。

2. 与日本高中国语教材重合程度超过大半的原因

据本研究调查,在基础阶段教材中的引用作品与日本国语教材中作品相重合的情况下,引用作品与日本高中国语教材的重合度最高。针对该现象的原因,笔者得到的回答有:“即使引用日本小学教材的课文,但由于假名过多,反而对中国学生来说不易阅读(A)”、“小学国语教材中的文章很少把词汇的难度统一起来或是把语法条目缩小到一项。若直接使用小学的课文,一来学生不易学,二来老师也无从指导(B)”。尽管乍看之下日本小学与初中的国语教材难度较低,似乎更适用于基础阶段,但实际上对日语专业的中国学生来说,日本高中的国语教材才是最易阅读、最适合学习的。

3. 基础阶段教材与日本国语教材的重合程度低于高年级阶段的理由

据本研究调查,基础阶段综合日语(精读)教材与日本国语教材的重合度低于高年级阶段。首先,基础阶段与高年级阶段的区别何在?从教师的意识层面来看,4名受访者说明了两者的担任教师、教学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基础阶段课程除会话与作文外,主要由中国人教师担任(A、B)”。“基础阶段与高年级阶段目的不同。基础阶段以学习基本知识为主,目的在于掌握词汇与语法。高年级则以了解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加深日本文化的理解、培养较高的日语

使用能力为目的。我(指教师 C 自己)学日语的时候,基础阶段课程由中国人教师担任,高年级阶段则由日本高中的退休国语教师授业(C)。“高年级阶段精读课大多由日本人教师担任。就我的观点,对这些母语教师,假如本来就是国语教师那就会凭借自己的教学经验授课,假如不是国语教师那么就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国语学习经验来进行教学。由此看来,中国现行的高年级阶段日语课基本上与日本的‘国语’课类似(D)”。

其次,对于基础阶段引用的日本国语教材中的作品不如高年级阶段多的理由,采访所得回答有:“第 1~4 册使用对象为一、二年级学生,以语法的学习为中心。由于日语国语教材上的文章并没有对词汇和语法进行控制调整,因此教学中较难使用(A)”。“基础阶段的文章最好是那些读过一遍之后大致就能把握内容含义的作品。而高年级阶段则最好使用需要多读几遍综合自己所学知识才能理解的文章(C)”。“中国人教师比日本人教师更清楚低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所以基础阶段的教材用中国教师编写的文章比较好(A、B)”。可见,若基础阶段综合日语(精读)教材的引用作品都是日本国语教材中的作品,则较难控制词汇、语法的教学内容,不便于实际使用。

六、结论与今后的课题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国语教育课题”已不再是热门话题,但当今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育仍有必要正视几个事实,即日本国语教育所使用的题材与内容确实在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无论在基础阶段还是高年级阶段,都有观点认为参考利用日本国语教材的理由是为了掌握“正确的日语”及理解“日本人的心”。当然,仅据此就妄断日语教育与日本国语教育完全一样或无端强调两者关联的必要性未免操之过急。日语专业综合日语教材中确实反映出了部分日本国语教育的内容,由于两者的目标和对象各不相同,也由此导致了若干问题。^②教师们也不认为仅靠日本国语教材上的题材和内容就能实现日语教育。^③

本课题的后续研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研究中国日语教育与日本国语教育的关联性,不仅要关注教材“正文”、“课外阅读”、“阅读”、“补充内容”等部分的文章,还应当对教材在词汇与语法的引导方法、设问的形态等方面加以比较考察。其次,此次研究证实基础阶段与高年级阶段的教材在与日本国语教材重合程度不一,教师们也指出基础阶段采用日本国语教材中的作品存在若干困难,由于基础阶段教育与高年级阶段教育在目的与方法上并不相同,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思考综合日语教育的目标、发展方向,对此做进一步的调查与考证。此外,以教材为切入点考察中国日语教育与日本国语教育的关系,不应当局限于现状。当代中国日语教育始于 1949 年,有必要对 1949 年至今的日语教学全貌进行历时性分析。

注 释:

①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海外的日语教育现状——日语教育机关调查·2009 年》,凡人社,2011 年。

②李倍建:《关于中国的日语教育以及日语教材的编写与使用》,《中央学院大学社会系统研究所纪要》,第 8 卷,第 1 期,2007 年,第 209-244 页。

③苏德昌:《中国的日语教育》,《日本与教育》,第 41 期,1980 年,第 25-38 页。

④苏德昌:《中国的日语教育》,第 33 页。

⑤其他类似项目还有:由财团法人日中技能者交流中心举办的日本初高中退休国语课教师赴华事业等。1989 年经笹川和平财团赞助,第一批共有 23 名教师前往中国。引自《日本经济新闻》,1989 年 4 月 10 日、1989

年10月2日;日中技能者交流中心网站主页。

⑥森田良行:《日语教育界的现状和将来——关于被国外所希求的人才》,《日本与教育》,第50期,1983年,第89-96页。

⑦李红旗:《日语教育的语法和国语教育的语法》,《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57-59页。

⑧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海外的日语教育现状——日语教育机关调查?2009年》。

⑨与日本的《教育指导要领》相当。《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大纲》分基础阶段(1、2年级)和高年级阶段(3、4年级)两部分。

⑩宿久高、周异夫主编:《日语精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⑪筱崎摄子:《关于精读教材的文本》,曹大峰主编:《日语教学与教材创新研究——日语专业基础课程综合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1-156页。

⑫中国大学日语专业的主干科目,多以阅读分析理解为重点而常被称作“精读”。

⑬彭广陆:《大学日语专业精读教材的语法系统》,曹大峰主编:《日语教学与教材创新研究——日语专业基础课程综合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2-97页。

⑭叮博光、内山和也、徐洪:《日语教科书和国语教科书的词汇比较》,Research Office Project 研究成果报告书,广岛大学,2003年。

⑮笔者就北京、上海、大连三地大学主要日语教材的情况咨询了大学日语专业教材的主要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等)并以出版社给出的教科书为调查对象。

⑯笔者在此宽泛地将日本国语教科书的年份定于“战后”,其原因在于,日本国语教科书从出版起到对中国日语教科书产生影响,这一过程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当对两者进行比较时,仅比较同一年的出版物可能无法找出两者的关联。事实上目前中国日语教科书所参考的日本国语教科书同时涵盖了年代较早与较新的教科书,因而有必要将比较对象宽泛地设在“战后”这一时间段。

⑰阿武泉:《全教材目录》,《战后高等学校国语教科书信息库》,2004年,调查机关:财团法人教科书研究中心附属教科书图书馆、东书文库、国立教育研究所教育图书馆。

⑱当教科书所有文章都由编者自撰,无引用作品时用“/”表示。重合作品数及其在引用作品总数中所占比例以“作品重合比率”表示。重合的作家亦同。

⑲当引用作品同时出现在高中与初中,或同时出现在初中与小学的日语国语教科书时,统计中会出现重复计算。之所以将重复的作品同时归入高中与初中,或初中与小学统计中,原因在于该统计的目的是为了观察中国日语教科书与日本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国语教科书的重叠程度。

⑳作品名依教科书上所记。由于同一教科书中有时会多次引用同一作家的作品,故“对应教材名”一栏内的教科书的个数与“作品名”一栏的作品个数未必一致。

㉑王婉莹:《日语专业低年级精读课教材分析》,《清华大学学报》,第19卷,2004年,第96-99页;筱崎摄子:《关于精读教材的文本》。

㉒田中祐辅:《从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材与日本高中国语教材内容的近似性体现的现代性课题》,《日本语学会2011年度秋季大会预稿集》,2011年,第99-106页。

㉓阿武泉:《全教材目录》,《战后高等学校国语教科书信息库》,2004年。

㉔笔者通过面谈采访调查了4名在教授综合日语课程中实际使用相应教材并具有教材编写经验的教师。教师A(女,教龄约30年,南开大学日语系)、教师B(女,教龄约10年,南京大学日语系)、教师C(女,教龄约10年,天津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D(女,教龄约15年,华东师范大学日语系)。调查以半结构化面谈的形式分别于2011年11月2日(A)、2011年11月2日(B)、2011年11月2日(C)、2011年11月3日(D)进行。笔者就以下两个问题向受访者询问各自的感想:本研究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大学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科书与日本中小学国语教科书的比较结果;笔者2011年出版的高年级阶段教科书和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的比较结果。所有回答均使用日语,后经中译记录而成。

㉕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大连理工

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②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②⑦田中祐辅、张玥:《适应多样化学习需求的日语教材开发实践——对基于复旦大学日语学习情况调查的“学习当事者需求”的再考及其效果》,《语言与文化论集》,第17卷,2011年,第169-185页。

②⑧窦文、李庆祥:《高年级日语精读课教材的内容、结构、规模》,《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93-96页;杨豪杰、彭玉全:《日语专业学生心目中理想的精读教材》,《中国教育学刊》,2010年第1期,第66-88页。

②⑨田中祐辅:《从中国大学日语专业教材与日本高中国语教材内容的近似性体现的现代性课题》。

备注1:本研究使用了阿武泉:《全教材目录》,《战后高等学校国语教科书信息库》,2004年。

备注2:本研究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别研究员奖励费)《关于针对中国日语学习需求多样化的“学习者主体的教材研发”的实践研究》(2011年~2013年,课题编号23·4780)资助。

(田中祐辅: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日本語教育研究科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静波)

梁启超的《黄帝》与伊泽修二的《皇御国》

李 海

内容提要 本文就梁启超作词的学堂乐歌《黄帝》与明治日本和学校歌曲进行了分析比较。经笔者调查研究发现,《黄帝》的旋律沿用伊泽修二的《皇御国》,而两者在国民的道德涵养方面发挥了相似的作用。本文探讨了由于政体国情的不同对作词带来差异的原因。从《黄帝》的作词可见学堂乐歌初期阶段借道日本,通过音乐改造国民素质的良苦用心。

关键词 梁启超 伊泽修二 黄帝 皇御国

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同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有一现象追溯着相似的轨迹,即伴随实业教育的逐渐充实,音乐、体育等科目也日益得到了启蒙者的关注而纳入学校教育的行列。

中国近代音乐是在与外国交流中诞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路径,即源于地理、文化相近的日本。中国的学堂乐歌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的影响,这一事实已由张前、马达等学者的先行研究得以验证。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驱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辛汉等都曾留学日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他们的功绩时,频频出现梁启超的言论。梁启超非音乐教育家,但在音乐与国民关系等理论方面,率先发表论说,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作为清末启蒙思想家,向国人介绍外国理论可谓当仁不让,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作为实践者的一面。^①学堂乐歌也不例外。梁启超在《新民丛报》57号(1904年10月15日)《饮冰室诗话》栏中一举列出《演孔歌》、《黄帝》、《爱国歌》、《终业式》等四首学堂乐歌,除《演孔歌》是康有为作词外,其余三首均为梁启超本人作词。梁启超作词的学堂乐歌和日本的学校唱歌有着怎样的联系?据笔者所知,尚无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因此,本论将举梁启超的《黄帝》四章,探讨其作曲和作词与明治日本和学校歌曲之间的联系。

一、梁启超的《黄帝》四章与明治日本

中国近代学校音乐从无到有,大约经历了完全模仿、部分改编、独自创新等三个阶段。《学堂乐歌考源》著者钱仁康先生说:“早期乐歌作者创作乐歌,以选曲填词为主。”^②何谓“选曲填词”?张前在《中日音乐交流史》中指出:“选曲填词一般是首先选择需要的旋律,然后配以合适的歌词,这既是中国传统的音乐创作方式,也是当时日本学校歌曲采用的主要创作方式之一,中国赴日留学生的乐歌创作基本上也是采用此种方式。这种方式适应了当时中国音乐的发展水平,对推动学堂乐歌的普及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③学堂乐歌早期阶段创作的《黄帝》会不会是“选曲填词”呢?在未找到相对应的旋律前,还不能断定。《学堂乐歌考源》一

书考证了 392 首歌的旋律,但包括《黄帝》在内,梁启超的音乐作品一首未录。其实,判断梁启超的《黄帝》曲调是否借助日本曲调的方法不难,即是看在《黄帝》之前,是否存在同样的旋律。经笔者调查发现,《黄帝》的曲谱与《皇御国》完全一致。以下是两者的比较。

黄帝	皇御国
	(4 / 4)二调四拍子
2 2 2 1 2 - 3 3 5 5 6 5 3 - - -	2 2 2 1 2 - 3 3 5 5 6 5 3 - - -
赫赫我祖 名 轩辕,降自昆仑 山,	ス メラ ミクニノ モノノフ ハ
3 3 5 3 6 6 5 3 2 2 2 1 2 - - -	3 3 5 3 6 6 5 3 2 2 2 1 2 - - -
北逐獯鬻 南 苗蛮,驰驱戎马 间。	イカナル コトヲカ ットムベ キ
6 6 7 7 5 - 3 5 6 6 5 3 6 - - -	6 6 7 7 5 - 3 5 6 6 5 3 6 - - -
扫攘异族 定 主权,以貽我子 孙。	タダミニ モ テル マゴコロ ヲ
7 - 7 6 5 5 3 5 6 6 5 3 2 - - -	7 - 7 6 5 5 3 5 6 6 5 3 2 - - -
嗟我子孙 无忘无忘 乃祖之光 荣!	キ ミト オヤトニ ックスマ デ

《皇御国》早在 1883 年 3 月已刊于《小学唱歌集》第二集中,比 1904 年 10 月公开的《黄帝》要早 21 年,由此可见,《黄帝》是借了《皇御国》的曲调。《小学唱歌集》用五线谱,而考虑到《黄帝》用数字谱,那样的话《黄帝》的曲谱不一定是借用《小学唱歌集》。梁启超在刊登《黄帝》的时候,《皇御国》的旋律被学校唱歌、军歌等广泛采用。大多数唱歌集不用五线谱而用数字谱表示。原来由五线谱表示的《皇御国》,为普及而改为五线谱的情况不在少数。中国在西洋音乐接受的初级阶段,关注于数字谱的便捷和高效,使其得以广泛利用。梁启超刊载《黄帝》时,不用复杂的五线谱,而用数字谱即基于以上原因。

在日本为数众多的音乐作品中,梁启超的《黄帝》为何偏偏选择了《皇御国》的曲谱?笔者认为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众所周知,激情轩昂的歌曲其曲调多急促欢快,悲痛伤感的曲子多舒缓低沉。一首歌曲,其曲调、歌词、歌名三者相互关联,不可或缺。以下从作曲、歌名、歌词等方面比较探讨两者的关系。

(一)作曲

《黄帝》是梁启超受亚雅音乐会成员邀请而作。梁启超不止一次称自己是音乐的门外汉,^④故此可以猜测选曲应该是亚雅音乐会成员里专攻音乐的人。这其中,亚雅音乐会的创始人和中心成员曾志忞与梁启超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计三回刊登了曾志忞的记事。曾志忞于 1903 年入东京音乐学校,成为中国专攻西洋音乐的第一人。曾志忞的《教育唱歌集》的旋律基本上来自当时日本出版的唱歌集。^⑤综合以上情况考虑,《黄帝》的选曲应该是出自曾志忞之手。而《皇御国》在金田一春彦、安西爱子编《日本的唱歌》(上,明治篇)中,作以下解释:“这是少有的日本人作词、作曲的歌曲(中略)伊泽自编曲子,这首歌有将《君之代》、《纪元节》混合而成的感觉。”^⑥这不仅指出《皇御国》是伊泽修二作曲,还描述了此曲旋律上的特征。

在西洋音乐接受方面,日本与中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即从完全模仿到试作再到创作。《皇御国》正好是试作阶段的作品。那么《皇御国》的曲调有什么特点呢?金田一指出《皇御国》的旋律是《君之代》与《纪元节》混合而成。众所周知,《君之代》是日本国歌,其曲风含雅乐的

要素,和众多欢快激昂的他国国歌相比,低沉、悠缓,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⑦梁启超在听了《黄帝》演奏后,作出“和平雄壮,深可听”(《饮冰室诗话》第77则)的评价。《黄帝》与《皇御国》旋律相同,曲调所表达的氛围也理应相似。《皇御国》所表现得氛围正是《黄帝》所期求的。但是,旋律的决定也同歌名、歌词密切相关。所以,在考虑《黄帝》一曲为何选择了《皇御国》的旋律时,还有必要分析其歌名与歌词。

(二)从歌名看两者的异同

首先,从歌名上来看,《黄帝》与《皇御国》有着类似之处。黄帝是中国神话中的人物。《黄帝》四章刊登在《新民丛报》的同时,在日本的中国人社会之间正好兴起了一股黄帝热。^⑧中国悠久的历史、神圣的传统被赋予黄帝这一记号之中,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国家统一的标志而受到推崇。

《皇御国》强调的则是万世一系的思想,宣扬天皇和国家同为一体。《皇御国》收录于伊泽修二编撰的《小学唱歌集》(共三册)的第二册之中。新岛繁在《日本的唱歌》中说:“《小学唱歌集》的歌词大都基于东洋道德,含有露骨的教训调的新国家主义、国权主义的成分。”^⑨对照当时的动向可知,伊泽将音乐与国家相结合的举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其行动的一贯表现。伊泽在1890年2月11日天皇生日当天,创立了国家教育社,其目的在于证明国家教育之本义,发挥忠君爱国之精神。^⑩国家教育社机关杂志《国家教育》将以赞美天皇为中心的记事置放卷首,强调天皇在国家教育中的功用一目了然。

《黄帝》是对中华民族纪元象征的崇拜,《皇御国》是对日本天皇的颂扬。有日本学者指出黄帝像是受日本天皇“御真影”的影响而想象出来的结果。^⑪本文无暇考证其论说的可信度,但至少可以说,《黄帝》与《皇御国》在近代国民国家建设中,在凝聚国民方面有着相同的动机,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同时不能否认,日本的天皇颂扬与中国统一象征的想象存在着差异。就此,当时留日学子、从事音乐专攻的沈心工曾言:“日本则以万世一系自夸,与我国政府不同,而又改为立宪政治,下达民隐。为日本国民者,歌之咏之,固其宜也。而谓我国小儿,能茹苦如饴乎。又敬神咏圣之事,用之适当,可使爱国,可使自立,否则惟有迷信及崇拜古人而已,是在教育家之注意也。”^⑫沈心工考虑到由于日中两国政体不同,不能期待中国也如日本的音乐教育一样取得同样的成果。日本的做法不一定适合于中国。这样的话,以神话人物为主题的歌曲,真的可以期待借此培养青年们的爱国心和自立精神吗?处理不当的话,会不会如沈心工所说的一样陷入迷信和古人崇拜的危险之中呢?梁启超选择了黄帝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题目,他将作如何处理,在作词方面会下哪些功夫?

(三)歌词

《黄帝》与《皇御国》旋律相同,且歌名也有相似之处,其最大的区别在于歌词。首先,《皇御国》的歌词分为两节,由两人合作而成。第一节为加藤司书(1830-1865)所作。加藤本名德成,是幕末的勤王家、福冈藩士,庆应元年被疑结党营私图谋不轨,藩主命其切腹自裁。司书闻此神色不变,拜命自若,至博多天福寺毅然自刃。^⑬也就是说,《皇御国》的第一节由勤王家作词,其内容也反映出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境遇。沈心工在论及日中两国音乐教育异时曾提出,由于日本政体安定,加之民众教养颇高,《皇御国》这样富于政治说教的歌曲教授也无妨。但是日本歌曲的作词存在着沈心工未曾察觉的问题。先看第一节的歌词。

皇御国の、武士は、	皇御国の武士
いかなる事をか、つとむべき、	应胜任一切事情

ただ身にもてる、真心を、 只切身用真心
君と親とに、尽すまで。 事奉君主与双亲

这首歌以《武夫》为题载入《古今今样集》(加藤樱老编,聚星馆,1878年)中。歌词表现的对象是日本武士。其中“只切身用真心 事奉君主双亲”即所谓忠孝之意。可见利用儒教教义来建设明治近代国家的现象也反映到歌词创作之中。

皇御国的第二节由里见义作词,歌词如下。

皇御国の、男子らは、 皇御国の男子 投躯报明主
たわまず、折れぬ、心もて、 不挠不折
世の生業を、つとめなし、 用心从事世间生计
国と民とを、富ますべし。 富国富民

《皇御国》歌曲在创作之时,伊泽修二任职于文部省音乐调研所的同时,负责编撰《小学唱歌集》。其作词多依赖于稻垣千颖、加部严夫、里见义等当时的国学大家。伊泽在给《皇御国》编曲的时候,加藤司书业已逝去。于是伊泽依托里见义增加了一节。伊泽评价里见说:“此人不如稻垣、加部为世间所知晓,但实颇有能力之人,其著有语法书,作词高明,小学唱歌集中的歌词不少为其所作。”^⑩里见的作词沿用加藤司书的样式,但歌词的主人公由武士变为男子,使得加藤的勤王志士风格不复存在,这是日本社会武士阶级退出历史舞台的表现。加藤司书的作词强调忠孝精神,而里见所作“富国富民”则反映了经济产业为重的明治国家的理想。

如此“事奉君主与双亲”的教训、“富国富民”的理想是以谁为对象而阐发的呢?考虑到《皇御国》收录于《小学唱歌集》中,这可以作为解此问题的一个线索。《小学唱歌集》如其书名所示,是为小学生所编撰的音乐教科书。但当时的小学生究竟能否正确理解歌词的含义呢?答案是否定的。作为明治时期有代表性的音乐教科书,其歌词的特征是用难解的文言作成。《皇御国》也不例外。这样的歌词,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会作如何反应呢?下面举两例说明。

福岛县提出的关于《小学唱歌集》的意见书中称:“歌词多古语雅语,即使中学程度的学生也难懂,适合于小学儿童的就更少了。曲目也与小学儿童实际生活相关不多,平易快活及勇壮活泼的曲调也少。”^⑪

山梨县某师范学校提出的意见云:“本校采用的音乐学校藏版的唱歌集,此等多随时势推移而呈陈腐之观,(中略)本校采用的三种唱歌集往往多有不当地,例如《小学唱歌集》第二篇的《镜》、《皇御国》、《天津日嗣》。”^⑫点名指出《皇御国》不适合儿童唱诵,其中歌词难懂是最大的问题。

梁启超作词的《黄帝》四章,歌词比《皇御国》多两节。《皇御国》的日语发音由“すめらみくに”六个音节构成。中文的特征则一字音,同为七五调,单从歌词的信息量来讲,《黄帝》所表现的内容要比《皇御国》要丰富的多。以下列举《黄帝》四章,试析其作词的特征。

第一章

赫赫我祖名轩辕,降自昆仑山,
北逐獯鬻南苗蛮,驰驱戎马间。
扫攘异族定主权,以贻我子孙。
嗟我子孙无忘无忘乃祖之光荣!

第二章

温温我祖名轩辕，世界文明先，
考文教算明历元，还将医药传。
科学思想寻厥源，文明吾最先。
嗟我子孙遗传继续乃祖之光荣！

第三章

巍巍我祖名轩辕，明德一何远，
手辟亚洲第一国，布地金盈寸。
山河锦绣烂其明，处处皆遗念。
嗟我子孙保持勿堕乃祖之光荣！

第四章

绳绳我祖名轩辕，血胤多豪杰，
秦皇汉武、唐太宗，寰宇威棱震。
至今白人说黄祸，闻者颜为变。
嗟我子孙发扬蹈厉乃祖之光荣！

《黄帝》沿用了《皇御国》的七五调，歌词也采用七言五言交相更迭的形式。各章头一句虽以黄帝开头，但其内容决不只是说黄帝。在此黄帝可看作中国的代名词，也就是说《黄帝》这首歌的内涵在于讲述中国历史，特别是汉民族的历史。第一章主要内容是说黄帝驱逐周边的异民族，确定了中原的主权。第二章称赞古代中国高度的文明，追溯科学思想的源流，认为中国率先成为文明国。第三章歌颂中国富饶的国土。第四章列举中国古代明君，促使今人奋发。每章的最后一句，都有感叹词“嗟”，唤起演唱者的注意。笔者认为，感叹词“嗟”的有无直接影响到感情表现的效果。“嗟”是梁启超为了唤起民众而采取的强烈的、有效的修辞表现。且并非单单此处大量使用“嗟”这一感叹词，梁启超在抄译拜伦的《弔希腊》(The Giaour)时已有大量使用“嗟”的先例。^⑩

梁启超对自己的作词评价如何？答案似乎并不满意。他说：“亚雅音乐会之成立，鄙人尝应会员诸君之命，撰黄帝四章，该会第一次演奏，即首唱之，和平雄壮，深可听，但其词弗能工也。”在已经准备好曲调的情况下，那就有必要作词与之吻合。前述同为七五调的情况下，中文所表达的内容虽丰富，但如何将丰饶的表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是考验填词者手腕之处。实际上梁启超的填词，发挥了其古典修辞的才能，创作了不同寻常的作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举《诗经》例来说明何为出色的描写。“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嚶嚶学草虫之韵。”^⑪这些都是以叠字状物、生动描写的名句而广为所知。这些诗句的优点在何处呢？刘勰说：“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⑫也就是说，用少量的语言综合多种要素，感情形态就会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梁启超在形容黄帝的时候，同样使用叠字，例如，各章首联：“赫赫我祖名轩辕”、“温温我祖名轩辕”、“巍巍我祖名轩辕”、“绳绳我祖名轩辕”。其中“赫赫”、“温温”、“巍巍”、“绳绳”都是双声叠字，且前两章基本上句末用韵，后两章也尽量用韵。这样使声调谐美，既增加了诗歌的音乐性，便于吟咏，又酿成了顺滑之调，便于记忆。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其作词还包含了作者的一番苦心。为了向读者生动形象地传达黄帝的风貌，“赫赫”、“温温”、“巍巍”等古来常用来形容伟人形象的词汇，集黄帝于一身，最后，用“绳绳”来表现黄帝的子孙即读者，歌者自身生命力将延续不断。这种唤起读者主动性的歌词创作，使读者容易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抛弃了迷信的因素，

避免了陷入古人崇拜危机,达到了培养自信心的目的。

高妙的修辞虽说有易于唱诵的效果,但客观上来讲这些围绕着黄帝性格的描述,均不过是缺乏根据的想象,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为了配合旋律堆砌而成的成分。各章尾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嗟我子孙无忘无忘乃祖之光荣”、“嗟我子孙遗传继续乃祖之光荣”、“嗟我子孙保持勿堕乃祖之光荣”、“嗟我子孙发扬蹈厉乃祖之光荣”下线部分均为同义重复。这是事先准备了曲调,其形式受到拘束的情况下,作词如何与音节相吻合的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同为梁启超作词的《爱国歌》,因其歌词在先,后谱曲,与《黄帝》的选曲填词相比较,修辞方面迥然不同,其歌词如下:

泱泱哉我中华,
最大洲中最大国。
廿二行省为一家。
物产腴沃甲大地,
天府雄国言非夸。
君不见,
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
况乃堂堂吾中华。
结我团体,振我精神,
二十世纪新世界,
雄飞宇内畴与伦?
可爱哉我国民!
可爱哉我国民!

相比可知,《爱国歌》除了最后一句的复唱之外,没有一句重复。可谓不拘形式、行云流水般的赞美歌。《黄帝》的填词虽凝聚了中国古典修辞的结晶,但其为了配合旋律,出现了难免的修辞上的问题。梁启超对其填词下的“其词弗能工也”的评价即由各章末尾的同义重复而来。

二、《黄帝》与《皇御国》的创作目的

《黄帝》与《皇御国》都是正当时日中两国音乐界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的关心下诞生的歌曲。本节将探讨和比较两曲的创作目的。

《皇御国》例举了天皇的要素,成为富含说教性质歌曲的典型。但是,伊泽为何将音乐教育与国家教育相结合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制作《皇御国》的根本目的之所在。以下结合伊泽修二的经历分析其如何将音乐与国家相结合。

伊泽修二,号乐石,嘉永4年6月29日出生于信浓国伊那郡高远藩士之家。六七岁时入进德馆学习读写算术等普通学科。十二岁时,修完四书五经,读完无训点本的八大家文,且能诗文。明治七年三月,经同乡前辈迁新次推荐,年仅24岁即任命为官立爱知师范学校校长。明治维新后,被选为高远藩贡进士入大学南校。明治8年为考察示范学科留学美国。在马萨诸塞州立师范学校,校长特别为他开出免学音乐的恩典。这反倒刺激了伊泽不服输的精神,未接受恩典,转向当时波士顿市有名的音乐家梅森学习音乐。1878年回国后以文部省官

僚的身份置身于近代公立教育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在创立师范教育、特殊教育、体操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编撰教科书方面也竭尽全力。他主张实现国家教育,1890年创立国家教育社,1891年从文部省辞职,以后相继成立国立教育期成同盟会(1892)、学制研究会(1894)等组织,成为活跃在民间教育运动的中心人物。^⑩

通过伊泽的经历可见,他将音乐教育定位为近代国家教育的一环,并为此终身奋斗。因此,他编撰的由文部省审定的《小学唱歌集》中载有如《五常之歌》、《五常五伦之歌》等多首强调儒教主义思想的歌曲也就不足为奇了。

《皇御国》和《君之代》《天长节》一样,可谓忠君爱国歌曲的代表。伊泽在《音乐取调成绩申报书》中汇报了国家主导下的音乐教育的成果。在《音乐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他从“长短二音阶的关系”、“健康上的关系”、“道德上的关系”三方面探讨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在“道德上的关系”一节中,伊泽提出了音乐与人的本性深切相关的看法。他说:“音乐基于人性之自然,为感动激触心情之物,如喜悦的歌曲让人心喜悦,悲哀的歌曲让人心悲叹,无一不生心情的感动,所以唱正雅之歌时,心自正,听和乐之乐时,心自和。心和气正时,邪恶之念,不能由外而入。心无邪念之时,好善避恶为人之常理。以是正心,修身易俗,不如音乐。古语云‘礼乐不可以须臾去身!’圣贤重礼乐,如斯。”^⑪

伊泽虽在外国修得近代西洋乐理知识,但在论证音乐和道德的关系时,其理论依据却求之于中国古典。“礼乐不可以须臾去身”语出《礼记·乐记》第十九节。伊泽自传说:“十二三岁时已修完四书五经,通览和汉历史,唐宋八大家文,余暇时作诗文,对和歌俳谐也感兴趣。”^⑫可见伊泽的音乐理论亦基于其幼年的汉学素养。但中国古典有置个人修养为重的倾向,道德与国家相结合的理论探求不得不寻求于西方。于是,伊泽引用拿破仑的话说:“音乐在人情上给予至大的感化,人心中波及以非常之势力。所以政府就音乐这一学术,比之其他诸学术应予更多的奖励。名家创作的有关道德的歌曲,深感人心,这是道德论著,只诉诸智力的书籍所不能比拟的。”^⑬为此,伊泽还将《小学唱歌集》中的歌曲分类,将《君之代》、《皇御国》定位为焕发尊王爱国赤子之心的代表。

相应地,《黄帝》是基于什么目的创作而成的呢?可以说是和日本有着相类似的情况。

中国的学堂乐歌立足于西学东渐的历史转折点,浸沐于启蒙主义风潮的社会环境之中,在创设新国民上承担了重要一役。翻看当时的音乐教科书,虽说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含有道德、教训的歌曲实不在少数。^⑭留日学生受到日本音乐教育的影响,创作了明治学校唱歌的中国版本——《学堂乐歌》。其中,音乐专攻的学生,向国学功底深厚、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梁启超请教作词。梁启超本诗人,作词对他来说也并非无理的要求。实际上在为横滨大同学校、亚雅音乐会提供歌词之前,他已有创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等歌曲的先例。对于后进的要求,他欣然接受,并在《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栏刊载相关论文,阐明音乐教育的意义,期待中国音乐教育的进步。梁启超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⑮这一功利性音乐教育观注重音乐在塑造国民素质中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音乐的美学意义。在重视音乐的道德性涵养、改造国民素质方面,梁启超和伊泽修二的理论构成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此外,梁启超的音乐理论还求诸于古代中国乐学。梁启超说:“中国的乐学发达甚早,明代之前,其传统延续,并举《诗》、《楚辞》、《招魂》、《九歌》、《大风》、《柏梁》等例,说明古代诗与歌密切关联,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诗未有不歌者也。”^⑯韵文多可作曲,但清朝以来,“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

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其结果导致音乐衰靡,俚俗极甚”。梁启超批评当时的中国文学家于国民没有任何的影响,他指出:“不得不谓诗于乐分之致也。”也就是说,其原因在于诗与乐之分离,因而诗的精神不能广泛传播。于是,梁启超自己配合选曲,率先作词,用实际行动表明作为诗人应对社会承担积极的责任。

三、结 语

以上本文就梁启超作词的学堂乐歌《黄帝》与日本学校唱歌《皇御国》在旋律、歌词、创作目的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毋庸置疑,但其作为实践者的一面却较少引人关注。因此有必要在梁启超当时所处的明治日本这一语境下进行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考察。

再者,在考察学堂乐歌创作问题时,不应该只停留于曲谱、歌词等技术分析层面。学堂乐歌接受了原曲的哪些因素,进行了怎样的选择取舍?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必要作细致的分析。综合分析比较原曲的作曲者、作词者的经历及该曲形成的背景,不仅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还有助于加深对学堂乐歌形成的理解。本文就梁启超音乐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黄帝》与日本学校唱歌《皇御国》分析比较得知,《黄帝》如实地反映了梁启超的创作理念和当时所处的时代特征。梁启超采纳了日本学校唱歌通过音乐教育来塑造国民精神的理念,并亲自作词,体现了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实践精神和通过音乐改造国民的良苦用心。

注 释:

①例如,他作为将政治小说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而广为人知。他不仅打出“欲兴一国之政治,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社会,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经济,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风俗,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理论,还自己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②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第279—280页。

④参见《饮冰室诗话》第76则、第78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9、62页。

⑤参见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第287页。

⑥金田一春彦、安西爱子编:《日本的唱歌》(上,明治篇),讲谈社,1977年,第43页。

⑦同样歌名为《君之代》,今天我们听到的日本国歌《君之代》曾存在着几种其他的旋律,金田一春彦的《日本的唱歌》中收录的《君之代》与今天日本国歌的旋律相同。

⑧石川禎浩指出:“1903年,以东京为舞台的知识分子之间萌发出一鼓黄帝热”,参见石川禎浩:《20世纪初中国的“黄帝”热》,《二十世纪研究》,第3号,2002年,第3页。

⑨新岛繁:《日本的唱歌》,《文学》,第12期,1955年,第1276页。

⑩伊泽修二:《乐石自传 教界周游前记》,国会刊行会,1980年,第172页。

⑪参见石川禎浩:《20世纪初中国的“黄帝”热》,第7页。

⑫沈心工译:《小学校唱歌教授法》,上海文明书局,1905年,第21页。

⑬大桥微笑编:《勤王家百杰传》,嵩山堂,1911年,第315—317页。

⑭参见伊泽修二:《乐石自传 教界周游前记》,第75页。

⑮《音乐界》一卷四号,《关于唱歌集编撰的意见》(其一),帝国乐事协会,1908年,第25页。

⑯同上,第26页。

⑰参见拙文《梁启超译〈吊希腊〉——围绕木村鹰太郎译文的接受谈起》,《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

集》，第22集，2010年。

⑱《文心雕龙注》下册，卷十，《物色第四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3-694页。

⑲同上，第694页。

⑳上沼八郎：《伊泽修二》，吉川弘文馆，1962年。

㉑伊泽修二编著、山住正己校注：《洋乐事始 音乐取调成绩申报书》，平凡社，1971年，第110-111页。

㉒参见伊泽修二：《乐石自传 教界周游前记》，第3页。

㉓参见伊泽修二编著、山住正己校注：《洋乐事始 音乐取调成绩申报书》，第112页。

㉔比如在曾志忞编辑的《教育唱歌集》中，《老鸦》强调反哺之恩，《马蚁》强调团结精神。参见《教育唱歌集》订正3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附属图书馆藏，1905年，版权页缺，出版社不祥。

㉕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77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8页。

㉖同上，第58-59页。

(李海：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博士生 责任编辑：徐静波)

从汉冶萍借款案看辛亥革命时期 孙中山对日关系

周 坚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在汉冶萍借款案等筹款活动中,孙中山颇为积极。这些筹款活动牵涉到邻国日本的各方面力量。以汉冶萍案作为样本研究有助于解读辛亥革命期间的中日关系。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此案恰恰触犯了二十世纪以来南方绅商社会反应最激烈的所谓“出卖利权”问题。所以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 汉冶萍借款案 辛亥革命 孙中山 对日关系

1912年正值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在前一年,武昌的一件不经意的擦枪走火事件居然引发了影响中国百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后逼使从1644进北京维持了267年的满族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诸侯纷争和抵御日本的乱局时代。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1912年1月1日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短短一个多月,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个中原因一方面有南方军纪涣散、高层内部意见不合,但这只是表层原因,但更重要和深层的原因与孙中山筹款不力,无法兑现回国时筹资的承诺有关,这点甚至造成革命军高层对孙的不信任,最终只能跟袁世凯妥协,迁就北方力量。但孙中山在此期间,筹资不可谓不积极,甚至可以说废寝忘食、无所不用。这中间,跟邻国日本的筹资活动中牵涉各方面的力量,其中故事波云诡谲,而汉冶萍合资案正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筹资方向,将汉冶萍案作为样本研究有助于解读辛亥革命期间的中日关系。

一、孙中山与日本三井物产：“汉冶萍合资”借款的交涉

汉冶萍公司是近代中国兼采煤采矿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1912年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案闹得沸沸扬扬的当年,舆论即有如下说法:“汉冶萍借款,事甚复杂,而内容又极秘密,故其经营手续,殊不明了。若就报章所传述者观之,则此款为政府之主动乎?抑盛宣怀之主动乎?亦一足供研究之问题也。”^①除了推到台前幕后的盛宣怀,孙中山是此次与日本签订合办借款合同的参与者,为此他在当时就遭到来自革命阵营内部各派舆论的猛烈攻击,他所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面临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信任危机和解体危机。^②与日本签订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是孙中山在向以袁世凯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妥协还是向日本妥协问题上所进行的两难选择。孙中山从当时对中国革命前景的认识和对日本的认识出发做出决断,在遭遇日方融资失败后又积极与袁世凯磋商妥协,显示一个政治家过人的敏锐与灵活。

1911年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的丹佛获武昌起义消息后,没有立即返国,他在美国

各地发表演讲,寻求美朝野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以及美政府在革命党人和清政府间的中立,因为他明白经费问题是革命最需要的,也决定了未来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

11月24日,孙中山在无所收获的情况下由法国马赛动身返国。12月16日,在新加坡孙中山对来访的华侨支持者邓泽如等人谈到:“因迟迟而归国者,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借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③欧美融资未果,孙中山只能向日本抛去橄榄枝,途中向山田纯三郎表示,希望他帮助从三井物产借款一二千万日元。^④

29日,宣布独立的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故孙中山面对的是筹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棘手的财政问题,资金需求极其紧迫。当日,在山田纯三郎等人的安排下,孙中山赴三井物产上海支店,与该店店长藤濑政次郎会面,正式提出向三井物产借款请求。据山田氏的记载:“藤濑氏讲,如果汉冶萍能够华日合办,三井方面可以拿出五百万来,……孙中山亦表示同意;藤濑氏又说明答复需要一星期时间。”^⑤

日本方面对南京临时政府借款案的反应极其敏捷,12月31日夜日本制铁所所长中村雄次郎在东京拜访三井物产常务理事山本条太郎,谈到“南方支那政府向日本的各方提出了借款”。中村希望山本从有利于将来日本在中国获取有希望的矿山的国家利益出发,对借款案做出积极回应。因为从上海的藤濑那里也“传来了如果日本不在财政上援助南方政府,南方政府就会垮台的情报”。^⑥

参与年前12月29日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职员森恪于“1月5日赶回东京,向总社和益田孝等汇报”。1月11日,作为日本政府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向三井物产的借款案的表态,由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的日中合办汉冶萍大纲出台。各条内容如下:

“一、改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之组织为华日合办之有限公司。

二、华日合办之新公司股本,定为二千六百万日元。华股一千三百万元,日股一千三百万元(此款仍须从缓商定)。

三、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之所有一切缺款,备有确据者,由新公司接认。

四、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之所有一切产业物料暨权利,由新公司接认。

五、新公司总理华人一名,协理日人一名,办事总董二名,华日各一名(此外须有董事若干名,华日同数)。

六、总会计日人一名,归办事总董节制。”

该合办大纲在12日由西园寺内閣农商务省、外务省、大藏省等诸大臣协议后通过。^⑦由此,以日中合办汉冶萍为前提的南京临时政府借款案在日本政府方面获得支持。13日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正金银行神户分行致横滨总行电报反映了中国有关方面对上述合办大纲的反应:

“革命党财政代表何天迥携来孙中山电,提出汉冶萍公司合办案,承诺日本提出之一切条件,另由公司向革命党提供五百万元。是否允诺,要求即复。此事,李维格大体上同意,正与盛宣怀协议中。此机不可失,希速提出我方之条件,并祈同当局商议核夺。”^⑧

二、孙中山与三井物产的另一笔秘密借款案

“满洲”借款案是指,在以汉冶萍合资为条件的借款案谈判中,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日政府在2月8日之前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一千万日元借款。^⑨此项秘密借款案开始于2月2日森恪在南京与孙中山、黄兴签署前述三井物产与南京临时政府间的三份合同文件之后。^⑩森恪在与孙中山交涉该案前,曾请示过三井物产首脑益田孝,益田孝则将此事与政界元老井上馨进行商议,而井上馨又将森恪的计划通告正策划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山县表示:“赞成乘此机会,与革命党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于我。”^⑪得到支持的森恪在2月3日两次与孙中山会谈。森恪向孙中山指出:

“……显然,革命政府今后还有诸多困难,不依靠地理上、历史上有特殊立场日本之援助,断难成功。若阁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将其委诸日本,作为其代价而欲从日本得到特殊援助,以完成革命之大业,日本必会答应贵方要求。使用必要之手段。日本为保全满洲而不惜发动第二次战争,若能暗中与阁下携手,解决悬之已久之国策大问题,亦可以小努力避免第二次战争之利益。”^⑫

益田孝将来自森恪的情报立刻报告了井上馨,并致电山县,所谓:

“孙已承诺租借南满之事。但支那元旦以前若无一千五百万元,除将政权让于袁世凯外,别无他途……若日本承担此借款,已允中断对袁讲和,孙文或黄兴即刻来日缔结秘密契约。已与井上侯电话述及此事……祈速就此裁决与否商议,并且与政府协商”。

但井上和山县处均没有回音。6日孙中山再次要求森恪:“已将对袁世凯和谈延至9日,故9日前祈有确切答复。”在森恪催促益田孝几次之后,8日益田孝给森恪去电,其主要内容:

“与袁世凯之和谈虽非可容余等置辞之事,亦请转告对孙、黄深切之同情,余等祈孙、黄在于已有利地位上达成妥协,井上侯难于直接回答。目下汉冶萍之二百五十万,将设法于明日汇出……满洲一事,倘能来一人,劝告签定秘密条约,可望得到更多同情。”^⑬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其在南北对抗与和议中的地位始终遭遇财政状况的严重制约。1912年1月11日,就在孙中山委任阪谷芳郎负责设立中央银行的当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军参谋长,并制定了六路北伐的计划。此举应有孙中山对以允准日本协助中国设立中央银行为条件,在十日内得到一千万日元借款充满信心的背景。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在借款事上的迟疑,孙中山逐渐表现了对袁世凯的妥协。1月15日,孙中山电告南北和议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他即让大总统位于袁世凯,绝不食言。此际,长期支持孙中山,并在武昌起义后就来到中国的日本政治活动家、大陆扩张论者头山满、犬养毅诸人强烈反对南北议和及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1月21、22日,犬养毅两次致函孙中山,阻止其对袁世凯的妥协。犬养毅激励孙中山要“勇往迈进”,“北京已在阁下之掌中”;并告诫孙中山:“袁谲诈百端,心术不测,……愿阁下勿寸步去南京也。”^⑭孙中山事实上接受了犬养毅劝告,22日致电袁世凯,在原清帝退位条件下再增加五项条件,即北京不得设立临时政府,袁世凯必须公开发表服从共和的政见等,拖延南北议和的时间,以便从日本各方面获得借款。南北和议因此而陷入僵局,孙中山遭到临时政府内部的反对。在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以及招商局抵押借款案上,孙中山、黄兴加紧对盛宣怀及招商局施压正是在1月21日之后。2月2日,社会上已传闻“皇室退位,革党政府当同时取消,别立南北统一之政府,袁世凯为总统,唐绍仪为总理……”。2月3日,孙中山与森恪开始谈一千万日元租借“满洲”案。2月8日,清帝退位条款见报;2月9日,袁世凯已备好清帝退位诏书及给外国公使的文告等等,孙中山、黄兴已没有拖延南北议和的时间和理由了。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南北

和议成立,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大约就在这一天,三井物产交来汉冶萍借款中的最后一笔款——孙中山先前允诺给湖北军政府的五十万日元,孙中山嘱:“暂存三井,候议再拨。”^⑤此时他对借款已经兴趣不大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所有向日本提出的借款,都是出于巩固军队、维持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势力较量的考虑。为了从日本得到借款就需要对日本作出妥协,出让中国部分的利权。从孙中山的对日观的发展演变来看,当时尚处在对日依靠的时期,他并未将对日本的妥协看得比对袁世凯势力妥协更为严重。为了对抗袁世凯,孙中山选择了对日本妥协,出让中国利权,以获得他必需的资金。^⑥

三、南京临时政府与日签订“汉冶萍借款”的“立废”

2月2日,森恪在南京与孙中山、黄兴签署了以下三份合同文件。^⑦

从合同文件以及前面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汉冶萍公司从未参与三井物产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的具体谈判,盛宣怀的谈判对手仅是最终提供贷款的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盛宣怀与小田切是此笔借款的受授方,南京临时政府从盛宣怀处拿走了借款的绝大部分,盛宣怀从临时政府处得到归还私产的承诺,三井从临时政府处获得多项在华利权,以正金银行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则圆了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合办汉冶萍梦想。此次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中,汉冶萍公司毫无自身权益可言,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和三井物产间、南京临时政府与盛宣怀间交换利权的牺牲品。

1月末之后尤其是在2月9日前后,南京临时政府对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的真正到位有格外的迫切性,这与第二部分讲到的“满洲借款案”失败有关。孙中山在借款来之前只能假意同袁世凯谈判,最终由于在没有等到日本方借款前袁世凯承诺兑现,只得拱手相让大总统之位。

南北和议成功,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此时借款对于孙中山已缺乏意义,而且来自原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激烈反对也使借款事不可能再坚持下去。

本来,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一直是在三井物产与孙中山、黄兴及盛宣怀与小田切之间秘密交叉进行,但当1月29日盛宣怀与小田切之间中日合办汉冶萍草合同签署后,31日上海革命党报纸《民立报》就转发了日本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于此事极有不满之处”;同日上海英文报《时报》也发表了相同消息。^⑧虽经陈荫明和王勋等活动沪上各报馆主笔,舆论仍不能平息。攻击盛宣怀和孙中山的言论主要来自革命阵营内部各派力量。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在南京临时政府内的各种场合遭遇攻击。

2月5日,湖南共和协会上书孙中山反对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⑨2月7日,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张謇致函孙中山、黄兴,明确反对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12日,张謇以反对不能奏效请辞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长一职。^⑩2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湖北省议员刘成禺邀江西、陕西等省议员提出“反对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议案交参议院表决。^⑪2月9日,章炳麟致函孙中山反对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⑫另外还有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表示反对。在此情况下,2月9日孙中山复函张謇解释中日合办汉冶萍向日本借款案:

“……铁矿合办诚有如所示之利害。惟度支困极,而军民待哺,日有哗溃之虞,譬犹寒天

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也。……先生一言，重于九鼎，匡救维持，使国人纵目光于远大，为将来计；而亦令政府迫于救患之苦衷，权宜之政策，免为众矢之的，不胜厚望。”²³

孙中山复电黎元洪：

“汉冶萍原急不择荫。前途陆续仅交过二百万，随到随尽。现订仅以此数变为虚抵，而废弃合办之约。……前此借款，因清廷与民国互相抵制破坏，故难成就”。²⁴

从孙中山复黎元洪电可以得知，此时他已公开表示废弃中日合办汉冶萍约了。2月18日孙中山在第一次咨参议院会上就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作答：

“……政府据院议通过之国债一万亿元，因仓猝零星征集，颇难应急，遂向汉冶萍及招商局管产之人，商请将私产押借巨款，由彼筹得款后，以国民名义转借于政府，作为一万亿元国内之一部分。嗣又因政府批准以汉冶萍由私人与外人合股，得钱难保无意外枝节，旋令即取消五百万元合股之议，仍用私人押借之法，借到二百万元，转借于政府。”²⁵

孙中山显然不愿将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之真像公布于众。在这样的背景下，2月20日李维格接王勋紧急来电：

“反对合办将成大风潮，影响共和大局。咸谓孙、黄被盛蒙蔽。唐急邀弟会议，赵竹君在场，均谓：‘非请盛设法取消合同，无可解救。务速商盛电认取消，俾照电宁答参议院’。弟言：‘请政府废三井约’，唐谓：‘政府取消恐别生枝节，公司取消系解较易。将来帮助公司，政府自有办法。’速请盛决定，急盼电复，勋。”²⁶

此时已加入同盟会的前北方政府议和代表并风传将出任袁世凯政府总理的唐绍仪出面为南京临时政府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收拾残局。南北两大阵营的意向都要求盛宣怀充当“替罪羊”，其中包括南北和谈中的风云人物汉冶萍公司董事赵凤昌。2月23日孙中山在第二次咨参议院会上就汉冶萍、招商局两借款案作答，其中更细致地述及汉冶萍案的来由及其内容：

“汉冶萍之款系该公司以私人资格与日本商定合办，其股份系各一千五百万元，尚未通过合同于股东会，先由该公司借日本五百万元，转借与临时政府，而求批准其事，先交二百万元至三百万元，俟合办公司成立，交清五百万。该款已陆续收到二百万元。本总统以与外人合股，不无流弊，而其交款又极濡滞，不能践期，是以取消前令。惟已收支之二百万元。照原约须为担保之借款。”²⁷

孙中山答词为了隐瞒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是由他本人与三井物产积极策动的基本事实，导致许多情节的模糊和歪曲。

2月23日孙中山通过王勋电告盛宣怀：

“该草约，前虽批准，后以其交款濡滞，并不践期，已电告前途，汶[文]定取消，盛氏万不能以已由政府核准为借口。唐君等前商办法系为盛氏计。今各省反对，舆论哗然，盛氏宜早设法废去此约。且证书有须通过于公司股东会一语，不为通过，此约即废，不患无以处此也，乞速电告盛。”²⁸

孙中山意在要求盛宣怀认同他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来由的说法，并出面废约。与此同时，该日孙中山致函盛宣怀：

“杏荪执事鉴：森氏来，得见尊函。执事以垂暮之年，遭累重叠，可念也！保护维持，倘能为力之处，必勉为之。现在南北调和，袁公不日来宁，愚意欲乘此机会，俾消释前嫌，令执事乐居故里。区区不尽，即托森氏面陈。此颂旅安。孙文叩。壬子民元二月二十三日。”²⁹

在此,孙中山还是十分恰时地向盛氏重申了保障其财产的承诺以稳住盛宣怀,同时脱离与“汉冶萍借款案”的干系。此情此景甚令盛宣怀进退无据狼狈难堪,盛宣怀始终担心唐绍仪与孙中山合谋设陷阱于他,直至24日盛宣怀还一度欲以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是孙中山诸人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达成的所谓“沪三井之约”,也即“南京草约”,而非1月29日由他与小田切签字的神户草合同十条为理由,拒绝出面废约,并声称“我若再含糊,袁、孙并力集矢,死有余辜”,充满了欲说出真相、不愿作“替罪羊”的冲动。^⑩

盛宣怀的不安是有理由的。自孙中山废约主张出,社会即有“万矢集于一人”——盛宣怀的局面。盛宣怀不能不担心,即便孙中山有心兑现其保证盛氏财产归还的承诺,社会舆论的形势也使之无法实施。

2月22日《神州日报》载民社、湖南共和协会、江西联合分会、四川共和协会、河南共和协会、国民协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等《汉冶萍公揭》一文。该文谓,如盛宣怀不取消中日合办汉冶萍约,即“处以最激之办法”四条。^⑪

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迟至3月22日才在上海召开,全体通过否决中日合办汉冶萍案。3月29日盛宣怀致函孙中山:

“中山先生阁下:两上芜緘,度邀青鉴。汉冶萍股东反对,已正[式]函致日代表取消前议,并面告前途。[宣怀]一人愿负责任,不得另生枝节,似已默许,堪慰。下走交涉数十年,向以信义为操纵,用敢上纾尊廔。钢铁关系自强,需本甚巨,华商心有余而力不足,恐非政府与商民合办不能从速恢张,以与欧美抗衡也。闻公卸责后即离南京,而上海为社会人才荟萃之藪,八方消息灵通。可否檐帟暂住,以慰天下喁喁之望。敬请钧安……”^⑫

四、结 语

孙中山对借外债曾有这样的认识:“明知借债遗累后人,然不借债,则连后人皆无,故借债为生死问题,非利害问题,譬如有病不食药则死,故明知其苦而食之。”^⑬所以2月中旬,孙中山在面临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反对力量之后,始终打算将中日合办汉冶萍事坚持下去。虽然在当时资金问题已不再是重要的考虑,此举孙中山不免有维护个人声名的动机,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在坚持从来认为是正确的主张。

在废除合办案已成定局的3月16日,孙中山还在南京与三井物产的森恪密谈。据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向外务大臣内田报告的“孙氏与森恪氏密谈之大要”可知,密谈双方有如共识:“认为合办合同即使在股东大会上取消,但以其同三井所订合同和横滨正金银行借款合同及其附属合同,依然存在,于适当时机有使该案复活之意”。^⑭

1913年2月在访日期间,孙中山又由森恪等联络,与山本条太郎、益田孝及涩泽荣一等人,会议成立中日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

孙中山对日关系的复杂性是由多方面历史因素决定的,其中最基本的因素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者由于武昌起义而骤然被推到领导全国性的推翻清王朝运动的政治舞台前列。此时,无论是他们的主张,还是他们作为革命领袖的地位并不能在南方绅商社会中获得认同;南方绅商和社会精英在推翻清王朝的问题上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者达成共识,而在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具体行动方面没有提供支持。在这样的意义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在南方推进革命事业时力量薄弱,因此只能将巩固新生政权的资金来源的希望寄于外国,在

这一点上他们又不能获得刚刚由“保路”运动中走出来的南方绅商社会的支持。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此案恰恰触犯了二十世纪初以来南方绅商社会反应最激烈的所谓“出卖利权”问题。所以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注 释：

- ①《东方杂志》八卷十一号，高劳《临时政府借债汇记》。
- ②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
- ③《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67页。
- ④转引自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 ⑤转引自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第265页。
- 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2页。
- ⑦同上，第297、298页。
- ⑧同上，第296页。
- ⑨俞辛：《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4—135页。
- ⑩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第243页。
- ⑪俞辛：《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135页。
- ⑫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第253页。
- ⑬同上，第254—256页。
- ⑭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第453页。
- ⑮同上，第249页。
- ⑯见藤井昇三：《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从对日依靠到对日批判》，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 ⑰以上合同文件均见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第310—313页。
- ⑱以上资料见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第905、906、908页。
- ⑲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第190—192页。
- ⑳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第662—663页。
- ㉑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第247页。
- ㉒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560—561页。
- ㉓张考岩：《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第175页。
- ㉔《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8页。
- ㉕《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06页。
- ㉖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第250—251页。
- ㉗《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23—124页。
- ㉘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第253页。
- ㉙同上，第326页。
- ㉚同上，第253页。
- ㉛以上资料均见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第325—326页。
- ㉜黄彦、李伯新选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第333页。
- 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50页。
- ㉞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第348、350页。

（周坚：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静波）

日本女性姓名特征研究

吴 琼

内容提要 阅读日本名著《源氏物语》时,首先令人困惑的是人名。书中人物多以职务名称代替,特别是女性没有像样的名字,而且称呼上总在变化,令人费解。本文对日本女子姓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作了归纳和整理。日本古代与中世时,女子姓名不公开。近世与近代庶民不得公开姓,只可道名。

关键词 女性 姓名 代称

一、古代和中世时期日本女性名字不公开

日本古代与中世时,人们认为名字代表人格和精神,诅咒术潜在其中,^①被他人知道名字有被诅咒的危险。被他人呼唤名字也会使名字本身具有的神力或者叫生命力消失。所以人们努力不告知他人自己的名字。特别是女性更加恐惧被他人知道名字,因为她们相信被知道名字如同失去贞操一样。名字为人所知,就担心被他人控制。即使到朝廷工作,也不公开自己的名字。例如:紫式部、清少纳言、小野小町等都不是真名,她们的真实名字至今仍不为人所知。^②女子通常只告诉自己的丈夫真名。古代人认为呼唤他人名字一定会产生灵魂之间的共鸣。物体选择名称,名称选择物体。人名与商品名称基本相似。这和音乐伴舞一样具有共鸣之感。呼唤他人名字是异常亲密的行为。^③

然而,不告诉他人姓名又很不方便。因此就选用即使被他人知道了也没有危险的名称或没有神力的名称。“通称”(代称)就属于此种。“通称”一般为官职名称或住所名称,如:桐壺更衣、明石上、春日局、御休息所、中宫、更衣、北政所等。朝廷内人员的“名字”(姓)基本上是住所的地名或职务名称,而地方官员的“名字”则往往是地名,实质上是其领地的地名。^④“通称”后来转化为姓。同一人因住所改变,姓也随之改变。

现代称呼对方为社长、部长、科长、教授、太太、老师等等,也通常不直呼其名。可以说是现代式的“通称”(代称)。^⑤而反过来,近年来恋人之间互相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复古,意图掌控对方。^⑥

二、各时期女子名字的特征

从古代到现代日本人的姓氏分别存在“氏”、“姓”、“名字”、“苗字”、“明治新姓”等称呼。“苗”寓意小苗长成大树,期望家族人丁兴旺。^⑦“名字”易联想到别名,故改称“苗字”,日语发音相同。古代女性姓名由三部分组成。例如狭度勝妹壳,狭度是部族的氏名,勝是姓,妹是名,壳是女子的敬称,类似地还有狭度勝小妹壳、狭度勝宇提壳、狭度勝卷手壳等姓名。又如梶犬

養橘宿禰三千代，梶犬養是职务名，橘是氏，宿禰是姓，三千代是名。这都是日本人古代的名字用表音汉字标出来的。奈良时代女性名字如：若壳、広刀自壳、宮壳、真都壳、多治比、吉美候等都是用汉字来记录的日语。日本人的姓名因此有了表音汉字书写的姓的“改姓”高潮。^⑧大和时代上流社会的女性都用“一媛(ひめ)”、“一姫”。

平安、鎌仓、南北朝、室町各时代只有庄园“名主”阶层的资料，平民姓名的资料记载甚少。^⑨平安初期，女性的实名称呼上发生较大的变化。女性名字由“一郎女(いらつめ)”、“一比壳(ひめ)”、“一姫”、“一媛”等改变成“一子”型。“一子”是比“一姫”等更高一层的敬称。^⑩在奈良时代“一子”型多为男性所用。后来女性也开始使用。藤原不比等的长女宫子(文武天皇的妃子，圣武天皇的生母)、次女光明子(圣武天皇的妃子，孝谦女帝的生母)的名字中都带“子”字。淳和天皇的皇女分别叫氏子、有子、貞子、寛子、崇子、国子、明子。到了室町时代，丰臣秀吉的夫人名为北正所，侧室名为松丸殿，都是以住所命名。^⑪而在书面记载中，一般女子常以藤原氏之女、中原氏之女等形式出现，并无自己的实名。^⑫

从室町时代到明治初期庶民不得称姓，只能称呼名字。江户时代女子的名字多为假名，例如：さな、ちやよ、えつ、てふ、はる、とみ、しゅん、とめ、きよ、せん、いわ、さき、きやう、いよ、はつ、たけ、ひろ、うめ、かゆ、てつ、ふさ、りん、よね、よし、まさ、くに、たか、すけ、きん、わか、はま、りよ、まつ、こと、しま、かつ、みや、はな、やす、ろく、まる、いと、きそ、なお、ゆき、とな、わに。^⑬女性都以某人之女、某人之妻、某人之母的附属地位出现。如：稻叶正成的后妻福、春日局；庆喜的母亲有栖川宫之女吉子；岛津齐彬的继母“お由羅”；德川家康的正室築山殿(住所名)之侍女“お万”；德川家康的生母传通院(法号)出家前叫“於大方”；赖宣的母亲叫“お万の方”，等等。^⑭

明治8年2月13日，姓名公开成了国民的义务。明治31年6月21日，《改正户籍法》公布，规定女子结婚后要将娘家的姓改为夫家的姓。^⑮明治末年，原本只有皇家女子、贵族女子、大名家(地方官)的小姐才可以使用的“一子”型名字，一般百姓女子们也可以使用了。到了大正年间，“一子”型的名字更加盛行。

大正3年(1914年)，日本女子的姓名中“静子”居排行榜首。昭和年代的最初10余年里，日本女子叫昭子、昭代、和子、和代的为数众多。^⑯从整体上看，昭和年代女性叫“一子”、“一代”、“一江”的尤其多。^⑰昭和41年(1966年)“一子”型名字占绝大多数。^⑱京子、千惠子、英子、久子、惠美子占据排行榜前列。美智子皇后大婚后，很多父母给女儿起了同名。有意思的是，平时时期，叫“平子”的女性却很少，说明年号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笔者对东京都府中市武蔵台小学1985年至1991年出生的155名女孩子的名字进行了分析。下面的分析内容略掉姓氏，只分析名字。

“一子”型名字(43人)：祐子、加余子、聡子、亜希子、慶子、美智子、惠理子、礼子、唯子、久美子、典子、加奈子、千鶴子、雅子、容子、千惠子、貴惠子、雪子、紗世子、佐智子、惠理子、友季子、麻里子、秀子、優子、舞子、侑子、絢子、陽子、桃子、良子、多惠子、優子、真璃子、和香子、由貴子、法子、由佳子、美智子、祥子、美華子、麻子、陽子

平假名型名字(12人)：こずえ、あゆみ(3人)、しおり、ゆき、あかね、みなみ、さやか、あずさ、のぞみ、ちはや

单个汉字型名字(11人)：愛(5人)、香、静、惠、彩、瑛、葵

双汉字型名字(72人)：

祐香、美穂、美穂、友美、美波、一恵、麻美、麻里、麻衣、優美、美菜、彩華、香織、彩乃、幸絵、由桂、友美、春菜、美鈴、綾乃、有未、麻紀、愛美、絵美、未来、侑布、由里、莉沙、夏乃、未菜、里奈、莉紗、晴香、淑美、綾香、真依、利恵、絵美、菜以、優希、亜紀、千帆、由紀、沙織、和代、紘美、綾美、春香、清香、史織、麻衣、利奈、亜季、沙織、郁恵、有希、杏美、里美、彩香、香澄、未奈、有希、由佳、英奈、英里、瑞穂、愛香、由香、舞衣、輝恵、愛香、友里

三汉字型名字(17人):愛由美、沙也加、未希菜、百合香、佳央理、奈々絵、和香菜、麻梨絵、沙也加、五十鈴、美由紀、菜保美、友里恵、早弓里、百百合、恵里菜、由里絵、恵理加

其中“一子”型 43 人,完全假名型 14 人,其他都是欧美式表音型汉字名字。可以看出“一子”已不占多数,而流行于江户时期的假名型名字更是少之又少。欧化发音的名字成了主流,^⑩这反映出时代变化的新潮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崇尚欧美的心理。当然,在欧美式名字里,汉字表意文字仍占优势,说明汉字仍然以其意美而受人们的喜爱。

过去,日本男性和女性的名字差异十分明显,但如今男性名字女性化、女性名字男性化的现象也颇为常见。^⑪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的名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名字上的反映。

一般而言,在称呼上不能随便省略さん、くん、ちゃん、様、殿等后缀称谓。例如男性通常是“姓+さん”或“姓+くん”(对辈分较低的男性),而女性则是“姓+さん”或“名+さん”。さん、くん等省略の場合,通常表示两者的关系十分亲密。^⑫在现代社会,相信名字具有神力的人为数甚少,但是敬畏真名的风气仍然绵绵延续着。夫妇之间直呼对方名字经常被视为大男子主义者或是女权主义者。^⑬

在发音上,名字最后的音节常见的排列如下:

か[ka]:裕香、沙耶香、沙也加、静、百合香、晴香、綾香、春香、清香、さやか、彩香、由佳、由香、恵理加、愛香、誠香、彩華、由桂、清香、充加

み(mi):淑美、紘美、綾美、みなみ、あゆみ、杏美、里美、奈保美、絵美、麻美、優美、友美、愛美、香澄、いずみ、愛由美、美波、恵、のぞみ

い(i):真依、麻衣、舞衣、葵、彩、未来、愛、菜以

な[na]:美菜、春菜、未希菜、未菜、里奈、和香菜、利奈、英奈、恵理菜、未奈

の[no]:彩乃、綾乃、夏乃、郁布

え[e]:こずえ、幸絵、奈々絵、利恵、麻梨絵、郁恵、友理恵、瑛、由里恵、由利絵

り[ri]:麻里、香織、沙織 3 人、由里、しおり、史織、英里、早弓里、佳央理、香

ず[zu]:美鈴、五十鈴

き[ki]:麻紀、優希、亜紀、美由紀、有紀、由紀、美樹、ゆき、亜季、有希

さ[sa]:莉沙、あずさ

ほ[ho]:千帆、瑞穂、美穂

ね[ne]:あかね

よ[yo]:真誉、和代

ら[ra]:さくら

や[ia]:ちはや

か、さ、な、ら、やの母音都是[a]。日语的元音[a]是开口最大的元音,口腔高高抬起,喉咙嘴唇都敞开。它给人的大脑以无拘束的、开放的、不受其它限制的生理感觉。^⑭正因为如此,很多

日本父母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不再费尽心思寻找教养很深的名字,而是选择大方、开朗的ア[a]音结尾的名字。故ア行尾音的名字最多。

这其中,カ[kɑ]音最多。辅音[k]音有坚硬、强烈、快速、干脆等感觉,能够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给人不扭捏、勇往直前的印象,所以カ尾音的名字众多。^④

日语的イ[i]音尖利、向前。イ音的名字很多,仅次于ア音。イ[i]音气流从喉头里面向口腔中央猛用力发出,给人有前进、决断的感觉。^⑤同时,小而机敏的事物多发イ[i]音。因此イ[i]音词尾的名字也颇受欢迎。此外,[m]为双唇爆破音,增添了向前的力量,所以ミ[mi]音的名字众多。[ki]音词尾的名字则被认为充满个性。

オ[o]音口腔成大圆洞,声音在里面震动,使人有被包容的感觉,让人放松。开朗、豁达的事物多用此音。^⑥因此,彩乃、绫乃、夏乃、郁布、真誉、和代等名字给人以沉着、成熟的印象。^⑦

エ[e]发音点在前,舌面平展,感觉身体向下沉,有深奥、委婉、高雅之感,故女子名字常用。^⑧

ウ[u]音舌卷拢积蓄力量,被动忍耐痛苦时人常会发出ウ[u]音,因此ウ[u]音让人有内向、充满潜力的感觉。^⑨

[n]音舌头接触上颚,[n]和[a]组合成ナ[na],体现亲密开放之感。^⑩

结 语

日本女性名字在古代与中世时期不公开,以通称代替名字。近世虽然公开了名字,但是庶民不可用“一子”字型名字。明治维新以后,女子开始用“一子”字型名字。昭和年代,“一子”字型名字由兴到衰。到20世纪80年代,欧美式的名字开始成为主流,显示出日本人对欧美文化的亲近与融合。女性名字的演变体现了从私密到公开、从只用假名到用汉字来表记欧美语音的趋势。在发音上,女性名字多选择开朗、明亮、向前、宽容、爽朗的音,反映了人们希望焕然一新、相互勾通、相互包容的美好愿望。

注 释:

①奥富敬之:《日本人名的历史》,新人物往来社,1999年,第206页。

②奥富敬之:《名字的历史学》,角川书店,2004年,第175页。

③黑川伊保子:《日语为何美丽?》,集英社新书,2007年,第142—143页。

④奥富敬之:《日本人名的历史》,第80、90页。

⑤同上,第175页。

⑥同上,第179页。

⑦丹波基一编著:《姓氏由来事典》,三省堂,1986年,第31页。

⑧奥富敬之:《名字的历史学》,第120页。

⑨同上,第179页。

⑩同上,第161—162页。

⑪参见中嶋繁雄:《日本的名门100家》,河出书房新社,1991年。

⑫奥富敬之:《名字的历史学》,第179页。

⑬奥富敬之:《日本人名的历史》,第226页。

⑭中嶋繁雄:《日本的名门100家》,第232—235页。

(下转第23页)

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型

徐 青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类型的基点是在幕末明治维新时期构筑而成的。当时,对中国的负面认识反复地在日本社会出现,从中不难看出日本对于近代“他者”的认知。当然,“东方主义”起着极其重要的机能作用。对西欧列强而言,清朝帝国已病入膏肓,统治机构早已腐朽,故其内部的改革和革新势在必行。而日本则自视为抵抗西欧列强威胁的防卫线,中国因而成为与其同盟、合并的对象。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可以断然实行侵略中国的基本认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关键词 近代日本 幕末 明治维新时期 中国认识

一、引言

近代日本^①是如何认识中国的?日本政府、民间组织、学术团体等各种机构所实施的研究项目对中国认识的视线各异。一方面,短时间内的媒体诱导会使“他者”认识发生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也会使双边认知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认识的主体是谁,属于哪个阶层?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这一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山根幸夫等编著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入门》对到1980年为止的、有关“近代中国认识”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论。^②由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日文化论集》^③和由小岛孝之等编著的《异文化理解的视线——从世界看日本,从日本看世界》^④则是中日研究者通过共同举办研讨会、形成专题论文集的代表作。前者是中日大学和研究所交流十周年纪念活动编著而成的国际会议论文集,后者则由东京大学与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AIEJ)共同在2001年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东西交流与日本”的演讲、论文、口头发表、讨论内容构成。后者的序文里这样记述到,“把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并且把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从傲慢中解救出来,使异文化交流成为真正的有建设性的事情,应该回顾异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应该在历史的足迹中学习智慧”。^⑤

此外,基于庆应义塾大学地域研究中心1993年的会议而形成的中日共同研究报告论文集《日中关系的150年——相互依存·共存·敌对》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与会代表提出,如果把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只以侵略作为事实的话,是片面的”,应该从“相互依存·共存·敌对”等诸多方面来把握中日关系。此次会议提出了以下几个视角:第一,“时代的区分问题”(在议论近代中日关系史时,其起点的设定极为重要);第二,“要从多角度来看待中日关系”;第三,“看待中日关系不应该只局限于双边关系,应该从多边视角来看待”。^⑥

近年来,在日留学的中国研究者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比较”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如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国人

的日本观》^⑦分析了日本的有识之士如何认识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败北一事,从中学到了何种经验。王晓秋认为,当时日本有识之士的普遍观点是,清朝的败北对日本来说是“前车之鉴”,日本应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中国的失败是由于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绝对化、鄙视西方文明是“禽兽之道”的结果。中国战败的真正原因在于没有吸取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也就是支撑近代军事装备的科学技术,未能对其学习吸收从而强化自身。

此外,大妻女子大学钱国红教授的《日本与中国的“西洋”发现——19世纪中日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形成》考察了同属东亚的中日两国的关系,回顾了两国对近代化世界的认识方法与世界意义。1842年的鸦片战争清朝败于英国,与日本经历黑船来袭仅仅相隔了11年时间。在此期间,中日两国都处于欧美列强进入亚洲和俄罗斯南下的危机状况之中,日本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在分析幕末维新期的日本知识分子认知的基础上,钱国红提出的问题是“日本成功的秘诀到底在哪里?”^⑧

二、鸦片战争前日本对中国的认识

日本的中国观及其变迁长期以来是中日学者探讨的重要领域。文本分析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般路径,分析的中心在于探究谁对中国进行了怎样的叙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数字化的进步,辅之以各种社会调查法,从社会学、统计学的学科视角进行的分析日益增多。但对于“认识”问题,除了数据统计和经验研究之外,理论性的考察仍不可或缺。

小岛晋治对“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作了长年研究,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⑨他认为,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类型的基点是在幕末明治维新时期构筑而成的。当时,对中国的负面认识反复地在日本社会出现,从中不难看出日本对于近代“他者”的认知,具有西欧东方主义^⑩经常表现出在对近代他者进行表象时所蕴含的诸多特征。

对于近代日本而言,考察其与中国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关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国学”的动向。第二,日本的所谓划时代的“来自西欧的冲击”,即佩里来航时期开始频频出没于日本近邻海域的“异国船”(黑船)。上述两种内外动向必须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近世日本的儒者们,一方面认为“夷狄(清朝)”是在对抗欧洲势力时“与神州唇齿”的国家。他们既不断地否定清朝与“中华”和“汉土”之间的关联,又由于儒教保持着些许对清国的敬意和亲近感。另一方面,国学者们又以日本建国神话的所谓“事实”为基础,把日本称为“万国的根本”。这与儒教的名分论截然对立。同时,在日本国内不同的国学学派对“清”的认识也大相径庭。因此,正如植手通有所指出的那样,上述矛盾心理“是日本中心主义对中国自卑感的心理反映。在他们的心里,对中国文物尊敬的意识之根异常强壮而牢固地存在着”。^⑪

日本的这一自卑感与其自我同一性问题交错而成。小岛晋治认为,这一自卑感“是从18世纪后半期才开始强调的”,日本中心主义源于来自欧洲诸国的压力,在压力面前日本的国家意识有所提高,终于强烈地意识到向俄罗斯的千岛、北海道等北边进出的契机已经到来。他认为,“日本的自我同一性应该在何处寻求?这是思想上的课题”。同时小岛晋治又指出,18世纪末以后日本通过兰学开始学习欧洲特别是医学、天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和航海术。这些兰学者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对中国文化崇拜展开批评。^⑫由此,日本不再把儒学看作唯一绝对的文化价值,开始认识到儒学不过是世界上存在的多样文化中的一种,进而促发了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江户后期因《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而闻名的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曾言,“日本应该比支那更有名誉,因为日本从神武以来皇孙没有失传过,也没有被他国侵犯过”^④。他进而认为,“文字是记录事情,述说感情为宗旨”,“支那文字有数十万之多”^⑤,因此日本的平假名文字以及欧洲的拉丁字母比汉字更为优越。在他看来,与汉字相比,日本的平假名文字记忆和书写更为便利,故提倡从汉字文化中自立的言说。类似的语言革新的倾向在18世纪的近世日本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并对近代日本性格的生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一判断日裔美国学者酒井直树已有过研究。^⑥

东亚国际政治情势的变化,也传到了锁国(幕府管理贸易)下的日本国内。渡边华山曾写道:自1834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独占权以来,英国开拓东亚市场的动向一时非常活跃。日本也成为备受瞩目的对象。1837年在中国的英国官兵们还一度有过占领无人岛(小笠原诸岛)的计划。尽管如此,一直到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为止,大多数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认为,清朝是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国强国。鸦片战争成为日本知识分子改变对清朝态度的一个分水岭。

另一位幕末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继承了本多利明的贸易立国论,主张用殖民地经营论来对抗俄罗斯,占领堪察加半岛、鄂霍茨克海和阿拉斯加。他认为,为了防备英国和美国并吞亚洲,日本应重视小笠原诸岛、菲律宾、爪哇和婆罗洲等地区,并主张对这些地区进行开拓经营。在1808年的《防海策》中佐藤信渊提出,大清国在日本的附近,万一有狡猾的君主出现,起了“兼并”日本之心,对日本来说忧患甚大。因此,日本宜谦恭地向清国提供大量金钱,努力与其结成“同盟国”,两国交易“必须以亲善睦邻交易为宗旨”。

然而15年之后的1823年,佐藤信渊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宇内混同大论”。根据小岛晋治的总结,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大论”主要有以下内容: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有安抚“万国苍生”的使命。它的第一步就应该吞并中国,如若方法得当,这一步用不了5年或7年。而最佳的路径就是首先夺取最易得手的满洲。在他眼中,“满洲人”性子急、没有谋略,“支那人怯懦、容易忧虑”,对于一点点小事就会惊动大家来挽救事态。如是,则人力、财力即感疲惫。从北京到满洲海岸需穿越过辽阔的沙漠、危险的山丘,比从日本渡海过来甚至还要困难,所需经费也甚多。至征服了满洲之后,不妨对当地人施恩施惠使其驯服,再使用他们即“夷狄(满洲人)”来征服支那。

三、鸦片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佐藤信渊在其《存华挫狄论》中又提出了以下的主张。

……满清固为夷狄,英国亦夷狄,然愚老(满清)为英国所败……对今世而言,满清为大国,断不似忽必烈之蒙古,无侵略吾国之行径。然近来不再对外行使武力,故英夷船师乘机来侵,数仗均惨败,江南四省亦流血受伤。满清无力防卫对抗,只得支付赔款,割让五市,以此乞求和平……计算国益之时,西方夷狄之贪婪终是祸害,或来犯东方,直至吾国。故希满清君主卧薪尝胆,济贫恤亡,上下同劳苦,练兵数年,率义兵复仇,讨伐英国夷狄,将其驱逐出被侵之地,一个不余,以使清国成为吾国永远之西部屏障。^⑦

从以上“无侵略吾国之行径”的断言中可以得知,佐藤信渊认为惨败于英国、割地赔款的

清朝对日本已非威胁。真正的危险在于“西方夷狄”“来犯东方”甚至侵略日本。

之后的中国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八国联军冲入举世闻名的世界之园圆明园,把园中之宝洗劫一空后,放火焚烧了圆明园。这次事件的起因史学界众说纷纭,其中一派认为是英国几次三番的开国劝告遭到清政府无视,这是英国对清政府扣押其外交官31人的报复。此事件彻底磨灭了日本人眼中清朝政府的帝国形象,使之深切感觉到西洋的威胁正在日益临近,本国如不进行改革,将步清之后尘。

清朝第二次战败于英国一事,使日本把清朝视为“真正柔弱的国家”。江户末期的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甚至感到一种“幻灭”,认为清朝的“疾病已经急速地进入到肝肺,对此没有任何治疗的方法”。“日中连带论”中希望通过“满清”国内的改革回复国力的想法完全基于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

曾任海军奉行的胜海舟进一步勾画了日本、朝鲜、中国结盟的蓝图。这一蓝图得到了长州藩领袖、政治家、岩仓使节团副使桂小五郎(1833-1877,后改名为木户孝允)等人的同意。在文久3年(1863年)4月27日的日记里,胜海舟这样叙述道:

……今晨,桂小五郎、对马藩主大岛友之允同道而来。议论有关朝鲜的事情。我的想法是,当今的亚洲并无能够抵抗欧洲人的国家,因为各国的规模都很小,缺乏对抗欧洲大国的远大策略。现在,我国应制造船只,向广大的亚洲各国的领袖进行劝说,纵横联合,一起来强大海军,无论如何,只要能够研究学术,就能躲避他们的蹂躏。首先要向邻国朝鲜劝说,然后是支那……^①

胜海舟所说的强化海军力量与研究学术成为推动亚洲“纵横联合”的基础。他们对当时欧美“东方主义”了解深入,将其归结为“知识就是力量”。在推出亚洲连体论的同时,不少日本学者又纷纷主张进攻朝鲜和中国,并有效构筑势力。此时出现了所谓的侵略亚洲他国论,希望以此对抗欧洲的力量。曾经提出过“小日本主义”的幕府末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的弟子、幕末志士吉田松阴(1830-1859)在1855年给其哥哥的书信里,介绍了“同志一致的意见”:由于与俄罗斯、美国的既有约定,日本不宜单方面违约,从而在夷狄面前失去信用。但在遵守规则、崇尚信义的同时,日本应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将“比较容易得手的朝鲜、满洲、支那先割为已有”,在贸易上失手于俄罗斯等国的利益要从朝鲜、满洲的土地上来得到补偿。^②

幕末志士越前福井藩的桥本左内(1834-1859)也在1857年的书信中说道,日本要独善其身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应合并独立的山丹(沿海州)、满洲附近的土地,在美国和印度领地里也必须要有领土。但是印度已经被西洋所占领,俄罗斯也已经向山丹周围伸出了手,更重要的是,日本自身的力量非常不足,无法与敌对的西洋诸国交战。因此,日本应该把亚洲看作是一个东方的屏障,把西洋视为同盟,把俄罗斯作为兄弟唇齿的国家。对于上述思想,小岛做了以下的概括:

……亚洲连带论也好侵略论也好,西欧势力在向全世界扩张。全世界都在起巨大的变化,日本应该怎样保持“独立”?应从现实的观点出发提出主张。但是,这个“独立”对别的诸国、诸民族来说也是同样需要尊重的普遍原则思想……所以,彻底地以自己国家为本位,……同样的人物既可以成为连带论者,也可以成为侵略者。^③

“独立”是西洋诸国必须尊重的“普遍原则”,但是作为“他者”的亚非诸国是在进入20世纪后半才终于在形式上被认可为“独立”国家的。在19世纪的西洋诸国眼中,非基督教的国家根本就不是与本国平起平坐的“文明国家”。日本对西洋列强的“双重标准”比谁都敏感。鸦

片战争当然不用说,只要看看《万国公法》等中体现出来的治外法权和不平等关税等就一目了然了。同时,日本开始认识到那些原先在西欧列强的“国际关系”基准中不被适用的地域,将逐渐成为列强领土扩张的对象,其中就包括北海道、冲绳、台湾、朝鲜半岛等地。一方面是西欧列强诸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另一方面是东亚的“国境的暧昧性”,两者的间隙被日本渐渐地涂抹掉。

四、结 语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式”被逐渐构筑而成,在明治近代国家成立后也持续存在着。清朝作为抵抗西欧列强威胁的防卫线,对日本来说,成为必须与其结为同盟或者合并的对象。在西欧列强眼里,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清朝国体已很脆弱,它的统治机构已经腐朽,内部改革势在必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大清帝国对于日本来说从被仰视的对象变成了不能步其后尘、需引以为戒的“劣等生”形象。

注 释:

①笔者在本文所提到的“近代日本”所指的时期开始于1868年12月23日(明治元年10月23日)通过明治维新、以明治政府开启的新时代,止于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败战的1945年。

②山根幸夫等编著:《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入门》,研文出版,1992年。

③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神奈川大学·浙江大学学术交流10周年纪念 中日文化论集——多角度的研究》,劲草书房,2005年。

④小岛孝之等编:《异文化理解的视线——从世界看日本,从日本看世界》,东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同上,第III页。

⑥山田辰雄编:《日中关系的150年——相互依存·共存·敌对》,东方书店,1994年。

⑦王晓秋:《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国人的日本观》,东方书店,1991年。

⑧钱国红:《日本与中国的“西洋”发现——19世纪中日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形成》,山川出版社,2004年。

⑨小岛晋治:《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以幕末·维新时期为中心》,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日中文化论集:多视角的提议》,劲草书房,2002年。

⑩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⑪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书店,1974年,第241页。

⑫小岛晋治:《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以幕末·维新时期为中心》,第96页。

⑬本多利明:《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岩波书店,1970年,第149页。

⑭同上,第29页。

⑮酒井直树:《过去的声音——18世纪日本言论的言论地位》,以文社,2002年。

⑯小岛晋治:《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以幕末·维新时期为中心》,第104-105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笔者翻译。

⑰小岛晋治:《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以幕末·维新时期为中心》,第105页,翻译笔者。

⑱同上,第101页。

⑲同上,第106页。

(徐青: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责任编辑:徐静波)

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新篇章

——“江南文化与日本”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赵建民

由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协办的“江南文化与日本——资料·人际交流再发掘”国际研讨会于2011年5月27-29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次会议也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一次“海外专题研讨会”，

来自日本的20位学者以及国内的40余学者与会。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主持开幕式，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猪木武德教授、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分别致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末木文美士教授、北京大学严绍盪教授先后作了题为“日本对中国江南佛教的受容”、“中国南方地区与日本列岛之间文化交涉的历史轨迹考察——东亚古代文明共同体的实像研究”的基调讲演。研讨会共分为文人与文化、宗教、历史、建筑、贸易、艺术、文化交流等7个单元，每个单元均有3-4位学者的报告，并有2位学者作评论。尽管以“江南文化与日本”为议题的会议并不是首次，但围绕“资料·人际交流再发掘”这一议题仍别有一番新意。

此次会议所作报告的研究成果均十分注重资料的再发掘。如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的报告“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在上海游历及其与沪人笔谈资料”，就是根据他在大阪府中之岛图书馆“玄武洞文库”中发现的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当年游历上海、武汉的日记原本，以及与上海等地士绅笔谈的原稿所写成的，证实了田结庄邦光所见近代上海见闻诸事的真切、生动和具体，而时代又如此之早，确不多见，成为研究近代上海的第一手资料，无疑是极为宝贵的。又如鹿儿岛大学高津孝教授的报告“萨摩塔和锚石—浙江石材和东亚海域交流”，以岩石学的分析和岩石学专家的肉眼和放大镜的观察，分析了分布在鹿儿岛、长崎县、佐贺县、福冈县的20余座被称为“萨摩塔”的中国式石塔，确认其所使用的石料采自中国浙江宁波郊外的梅园石，同时又根据在宋元时期中国船的锚石残留在日本70余件遗物，说明宋元时期浙江船已能到达日本的诸多地区。显然，这些残留日本的中国产石材所制造的物品，也成了中国东海海域交流新的史料。

“人际交流再发掘”也是此次研讨会的又一个重点。“周作人文化认知中的江南文化因素”、“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江南”、“芥川龙之介的‘江南’”、“浙江商人王惕斋研究”、“关于朱舜水的东夷褒美”、“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上海认识的变迁”、“岸田吟香与上海文人圈”等报告均在各自课题上有着厚实的成果积累，故而能对相关人物作出画龙点睛式的阐释，颇有老课题焕发新意之趣。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榎本涉副教授关于“元末江南士大夫层与日本僧”的报告，阐释了前近代中日交流频度很高的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的共同点和相异点，指出前一时期的日本禅僧来中国后因长期在寺院里生活，故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到的中国文化

带回了日本,有着独有的特征,而后一时期因来中国的日本禅僧还能与其他士大夫阶层的俗家人保持交往,因此他们带回日本的除禅宗之外,还有诸如书画、诗文、医学、儒学、饮食文化等丰富多样的中国文化。台湾大学徐兴庆教授通过对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的介绍,描述张德彝(1847-1918)这个近代中国最初的英文学生、思想启蒙者摄取种种西洋文明、日本文化以及他自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经验,根据《航海述奇》等约 200 万字的浩瀚文献,探讨了张德彝对异文化的认识和思想变迁,进而阐明其作为“他者”有关中国近代化的文化异说,从研究视角上一改以往“双向交流”为“众向多元交流”,致使人际交流的历史研究更为深入和拓展。

扎实的比较研究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特色。如“从吴越的‘禹祭’到利根川的‘泥祭’”的报告,就是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利根川的“泥祭”脱胎于中国的“禹祭”,但经日本民族再创造后早已脱离原型,成为日本民族特有的神话。“干栏还是高床——日中建筑比较论的尝试”阐释了目前还留存在东南亚被称为“高床”的民族建筑,其起源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其在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中屡受蔑视被称为“干栏”。论者指出,奈良时代宫廷举行仪式时穿着鞋子,而到了平安时代则是脱鞋后在高起的地板上举行仪式,这种变化被视作有悖于黄河文明流派的建筑观,回归到长江文明风格的建筑理念,论者以此为出发点对日本的“国风文化论”进行了再探讨。“京都寺院庭园与江南文化”的报告,就在对中国大陆佛教与日本佛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以京都周边的佛教各宗派所修建的寺院为研究对象,对日本佛教中独有的寺院庭园进行研究。“清代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的报告,以中日长崎贸易商品结构不断的增减变化为例,阐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既是日方实行“正德互市新例”后的必然结果,又是中日两国间各自商品生产关系发展的直接反映,也是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时尚要求的反映。“日本史与亚洲史的接点”的报告指出,据古籍记载,鹿儿岛的硫磺岛将硫磺经九州西海岸运至博多,再从博多经由宋朝海商的贸易船运往中国,作者将其与同时代的东南亚和西亚经海路贸易将硫磺运往中国的历史事实作比较,即以硫磺的国际贸易为素材,探讨了日本史和亚洲史的关联。“从夹纈的东传及流变看江南文化与日本的渊源关系”的报告,阐释了始于唐代的夹纈工艺早在 8 世纪中叶就传入日本,在日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后来中国将夹纈改称为“夹板染色”,则可能是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似乎认为传入日本的夹纈与江南无涉,但近年来的研究进展正呈显出江南文化与日本之间在夹纈工艺交流方面的密切关系:传入日本的夹纈,其源头应在浙江一带。

这次研讨会上涉及中日战争时期“文化交流”议题的唯一报告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细川周平教授的“中国趣味的战争时期的歌谣”,他认为电影、文学、艺术等大众文化在战争时期也曾被国家动员,承担了鼓动群众的民族意识、战斗意欲和同仇敌忾之心。歌曲也是被动员的文化载体之一,在 15 年的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出现了许多与战争相关的歌曲,其曲调和内容可谓纷繁复杂,报告者对于 1938 年以后出现的带有“中国趣味”的歌曲,如《苏州夜曲》等,从旋律、编曲、歌词、与媒体关联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日本大众对于其想像并欲求的他者形象的形成和发展。论文以日本对华侵略战争时的题材来探讨“中日文化交流”,这对“江南文化与日本”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

这次研讨会也关注着学界研究的现状和动向。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伊东贵之教授“日本的东亚海域交流史研究的现状和动向”的报告,详细回顾了该领域的研究历史,并介绍了近年来共同研究的课题和动向。文部科学省的科研资助项目“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的创生”(通称“宁波项目”)因其大规模的共同研究而广

泛引人关注,伊东贵之教授介绍了该项目的研究宗旨和成果,与会的日方学者还在会前专门安排了对宁波的学术考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宁波项目”参与人数多达 137 人,旨在探讨在东亚海域圈内日本文化历史起源的再构成,并力图达到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准。该研究项目至今已展示出了多元网络的样态,使海域交流史的研究充满了生气,已有众多研究成果相继出版。

为期三天的“江南文化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既有精彩的报告、言简意赅的评论,也不乏不同观点的碰撞。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令远教授作了会议总结。他认为,中国江南地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源头,充分显示出中日文化交流渊源流长、根深叶茂、互为桥梁、始终不断的基本特征,这次会议对于推进中国江南地区与日本列岛之间文化交涉的历史踪迹考察具有很好的助推作用,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东亚文明史的研究水准。

(赵建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胡令远)

追思安部一成先生

尊敬的安部一成先生仙逝已经两个多月了,对他的思念常萦脑际。2011年10月26日深夜,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同事戴晓芙老师处获知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我校顾问教授安部一成先生与世长辞的信息,虽也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不胜惊愕和悲痛。次日晨,在去杭州前匆匆代表日本研究中心向家属发去近千字的唁电,但意犹未尽,一直想再写点文字以纪念这位复旦大学的好朋友、我的良师与益友。

安部一成先生生于1927年,毕业于日本名校之一的神户大学大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一直任教于山口大学经济学部,并曾连任经济学部部长三期直至退休。

山口处于日本国本州的西端,德川幕府时代为长州藩,该藩人杰地灵,在明治维新时与萨摩藩(今鹿儿岛县)一起起了很大的作用,名胜古迹很多,政治人物辈出,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是出总理大臣最多的县。

安部先生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很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在山口市乃至山口县及周边地区很有影响力。从山口大学退休后随即被聘为西南学院大学教授,随后又被邀请担任东亚大学校长,之后又担任获国际大学校长直至上个世纪末。故他的桃李满天下,在山口、大阪、东京都有安部门下的校友会,有自己的定期刊物,如此盛况在日本并不多见。

我与安部先生的缘分起始于1979年。该年8月为了考察改革开放刚起步的现代中国,山口大学组织了学术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并到复旦大学交流,安部先生任副团长,我作为接待员兼翻译与该团密切接触,从而相认识的。在交谈中我说自己的表叔曾留学国立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山口大学前身),而自己也曾有报考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当时该校设有中国系)的念头,因战争和无财力而作罢。是此一因缘我俩谈得很投机,安部先生一再嘱我若有机会访日一定要到山口叙叙。1980年,我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到东京大学留学一年。是年应安部先生的邀请到山口大学访问交流,我拿自己刚刚发表的《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一文与该校经济学部的师生进行交流,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该学部名佃恒教授随后将该文译成日文,刊登于该校东亚经济学会的学术刊物《东亚经济研究》(1980年10月号)上,洋洋18000字。而安部教授则在该刊上发表了对该文的评论,也长达9000字,一方面肯定在中国出现这样的论文实属不易,要旨也大致可以接受,同时也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我在论文中很强调科技革命的作用,而安部先生认为科学技术革命固然很重要,但对日本战后前30余年的高速发展的贡献度大约在30%左右,即没有我所说的那么高。

安部先生既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也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多样,我则不谙计量经济模式而甚觉不足。

这次对山口大学的访问对我而言有着更大的收获。即前述我的表叔毕业于山口大学的

前身山口高等商业学校,而我本人则在 1949 年独自离开家乡台湾奔向祖国大陆。从五十年代初起,因台湾当局大搞白色恐怖,致使我失去了与家乡父母的联系,三十多年来互相不通音信,尽管我已经到了日本,也不知老家新的地名和电话,无法联系。来到山口,我即托安部先生查找山口大学老校友——我表叔的情况,一查就查到了,我随即赶回东京,拜托同在东京大学留学而即将返台的中兴大学教授林先生带信到台北寻找我表叔,从而与老家联系上了,年迈的父亲得知分手三十余年杳无音讯的长子还活着万分高兴,随即在表叔的陪同下到东京,与日夜思念的儿子和儿媳(从未见过面)团圆,上演了一场人间悲喜剧,我们对安部先生真是感激不尽。

1982 年 11 月,应我校世界经济研究所(当时我任该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的邀请,安部先生自费前来我校讲学,日程是安部先生夫妇先到西安、无锡、杭州参观访问,然后安部先生一人留下来在复旦和上海日本经济研究会讲学约两星期。在复旦主要是给世经系、经济系、管理系、政治系、历史系师生讲学四次,包括日本经济现状和面临的基本问题;日本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日本经济计划诸问题;日本经济学界情况。当时复旦师生求知如渴,加上时值全世界“向日本经济看齐”的年代,听课师生每次都在 100 人以上,教室坐得满满的。在初冬季节,当讲课结束时都在下午 5 时过后,教学楼每个教室都灯火通明,学生早早占满教室自修,此情此景使安部先生深受感动,感慨颇深,多次跟我说“这种情况在日本几乎见不到了,中国有希望了”。在上海日本经济研究会(上海日本学会的前身)所做的两次报告包括日本经济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概况等内容,也都很受欢迎。

在这以后,安部先生与复旦大学的关系日益密切。1985 年和 1989 年我率领复旦经济学教授团访问日本,两次都访问了山口大学,受到安部先生的热情接待,请我们到他府上作客,以日本的美酒佳肴招待我们,至今我们这些老人仍记忆犹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拜谢希德校长之命开始筹建日本研究中心,安部先生也对此献计献策并给与个人捐款。1990 年日本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后,安部先生更是从学术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日本研究中心从 1991 年起每年都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题目都是我国经济建设直面的问题。在九十年代安部先生几乎每次都前来参加并发表论文。例如,1991 年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他发表的论文是《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与物价》,1992 年第二次研讨会上,他报告了《日本中小企业的活力》;1993 年第三次研讨会上,他发表的论文是《地域产业政策的变迁与将来的课题》;1994 年第四次研讨会上,发表的是关于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问题等等,都是切合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大问题,提出日本的经验教训供我方参考。

安部先生为人大度,很有亲和力。因常来我校参加研讨会等学术活动,与日本研究中心的专职人员、兼职研究员以及前来出席我中心研讨会的本地和外地院校、研究机构的日本问题专家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逢国际研讨会,在安部先生周围都会集聚一批人谈笑风生,成了我们研讨会的一道美丽风景线。因对我校的学术活动有很大贡献,1993 年 11 月,复旦大学聘请他为顾问教授,直至他仙逝。安部先生与我中心的大恩人伊东光晴先生也是好朋友,九十年代中期,我和沈浩同志陪同伊东先生夫妇和安部先生夫妇到西安参观兵马俑等,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本世纪初我们获悉安部先生罹患前列腺癌,并已是晚期,不胜惊讶,我访日时特前往山口市探望他。他告诉我:平时大意,不体检,发现太晚了,医生告知以日本最好的医术,“最多也只能活三年……”。我代表日本研究中心安慰他,祝愿他能度过此难关,在我日本研究中心再现他的英姿。2005 年,我再去探望他时,他说十分怀念复旦大学的朋友们,希望

有生之年再次访问复旦大学见见老朋友,见见可爱的复旦学生。2006年我们邀请他再来复旦访问,他很高兴,在女儿陪同下再访复旦,并向师生作了题为《日本经济的新局面与争议点》的演讲,众多师生听讲。他对我说:谢谢你给了这个机会,复旦的学生还是很认真的、很可爱的。2007年6月我访日,又从东京赶到山口市看望,仍受到安部先生夫妇的热烈欢迎,他们特地是一家高级的日本料理店款待我,共叙近三十年的绵绵友谊与感情。这次我看到他的模样比较憔悴,说话无气力,虽然从发现病情起已大大超过“三年大限”,但也许很难治愈了,暗暗伤心。回想起来,交谊已近三十年,每次访问都受到他们一家热情款待,每次先生夫妇都开车到新山口站(新干线)迎送,都请我到他府上或在宾馆共进盛餐,并带我参观访问山口县的主要市町村和主要企业,我也多次请他们到寒舍做客,吃大闸蟹等。安部先生还长期热心于日中友好的事业,担任山口县和山口市的中日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山口县与山东省、山口市与济南市、山口大学与山东大学分别是姐妹省县、姐妹城市、姐妹学校。安部先生在这方面也打头阵,花了很大精力。看了这样一位好朋友、好知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不胜心酸。这次我因日程关系,晚上赶回东京,安部夫妇当天还是开车(这次是女儿开车)送我到新山口站,在站台上久久挥手,难分难舍。这就成了我与安部先生的最后一别了。

现在可敬的先生远走了,他的杰出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他对复旦大学(包括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的深情厚谊,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先生辛苦了,谢谢您,请安息吧!

郑勵志

2011年12月29日

中心大事记

2011 年下半年

- 7月18日 日本卫材公司赤田董事长一行2人来访。
- 7月25-28日 郭定平教授访问日本防卫研究所并发表演讲。
- 7月25日-2012年1月 胡令远教授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学,担任京都大学客座教授。
- 7月25-30日 戴晓芙副教授与第一财经《人民币》专题纪录片制作组访问日本东京,进行相关采访和调研。
- 7月30日 由株式会社 MTG 赞助建造的中心3楼和室(光部屋)举行揭幕仪式。
- 8月9日 山口大学教授、复旦校友会会长葛崎伟来访。
- 8月17-30日 中心与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韩国崇实大学共同举办第四届中韩日三国大学生交流活动,主题为“TPP 究竟能带来什么? ”。活动为期十五天。来自台湾大学、俄罗斯远东国际大学和蒙古国立大学的6位同学作为观察员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 8月25-28日 郭定平教授赴雷克雅未克参加在冰岛大学召开的欧洲政治研究协会第六届大会,并出席了国际政治协会主办的《国际政治学百科全书》新书首发式。郭教授为此书撰写了 Marxism、Maoism 等政治理论条目,共计一万余字。
- 9月2日 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及日本国驻上海总领馆主办、中心承办的讲座“日本漫画:独特的历史与构造”在我校逸夫楼举行。讲座由日本著名漫画作家、日本京都精华大学漫画学院讲师岩见吉朗主讲。我校学生150余人参加。
- 9月6日 日本松山大学铃木老师及该校学生20人来复旦短期交流。
- 9月7日-10月14日 郭定平教授赴美国夏威夷参加“亚太安全合作高级研修班”。
- 9月13日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25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与复旦大学25名本科生进行交流讨论,主题为“面向未来的选择”。
- 9月20日 日本三井化学中国得丸总代表一行2人来访。
- 10月12日-11月16日 2011年度复旦·三井物产冠名系列讲座“日本社会与文化”举行,讲座为面向全校师生的系列讲座,邀请校内外的学者专家就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相关主题进行演讲。本年度分为4讲:10月12日,“从《源氏物语》到《古都》——作为日本文学舞台的京都”(复旦大学中文系邵毅平教授);10月19日,“近代日本与上海(1862-1945年)”(中心徐静波副教授);11月9日,“日本古代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接受与变迁”(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系主任赵维平

- 教授);11月16日,“村上春树与《IQ84》”(上海杉达大学日语系主任施小伟教授)。
- 10月21日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国际交流科上田千寻课长一行3人来访。
- 10月26日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校长、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安部一成先生因病逝世。
- 10月26日 张浩川副教授参加在东京举行的“2011东京国际航空宇宙产业展”,并发表演讲“中国民用航空器制造的发展与中日民用航空器制造合作的可能性”。
- 10月29-30日 由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后援的第21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环境问题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隆重举行。日本京都大学、中央大学、九州大学、广岛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中日学术研究机构的近50位知名学者与会。
- 11月3-4日 张浩川副教授参加在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举行的中日韩新能源政策国际研讨会,并发表演讲“中日新能源战略及其合作的可能性”。
- 11月7日 中心接受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内力先生生前藏书。
- 11月9日 熊本县广报课课长前田隆来访,商讨2012年1月熊本县上海事务所开所仪式事宜。
- 11月10日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领事井上爱子一行2人来访。
- 11月11日 日本财务省国际科山崎次长一行2人来访。
- 11月18日 日本成蹊大学国际交流课盐岛课长一行5人来访,续签互派学生协议。
- 11月18日 徐静波副教授赴日本参加由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在冲绳那霸举行的饮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移民、殖民、战争与饮食文化”并发表书面论文。
- 11月23日 瑞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调查部部长陶山健二访问中心,并作2011瑞穗证券冠名讲座第一讲“灾后重建和日本的资本市场”,校内师生40余人参加。
- 11月22-24日 张浩川副教授赴日本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日本企业的经营课题”,并发表共同研究成果《中日韩民营企业经营实态调查》。
- 11月24日 瑞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调查部高级研究员杉浦秀德访问中心,并作2011瑞穗证券冠名讲座第二讲“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企业经营战略的变化”,校内师生40余人参加。
- 11月28日 中心向余晓先生颁发兼职研究员聘书,当晚,余晓研究员为我校学生100余人作特别演讲。
- 12月2日 三菱商事(上海)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校园宣讲会在中心举行。
- 12月3-4日 郭定平教授、张浩川副教授赴日本关西大学参加“第二届复旦大学·关西大学经济论坛”。

- 12月8日 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贺宁馨副主任一行3人来访。
- 12月13日 日本国誉株式会社2011校园宣讲会在中心举行。
- 12月14日 由中心和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合作主办的2011年度复旦·三井物产冠名讲座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在中心举行。获奖名单如下:二等奖唐珂(中文系)、苏畅(哲学系);三等奖魏灵学(历史学)、张骥(中文系)、曹靖楠(国际政治系)、陈静文(法学院)、史忠秋(外文系);另有12位同学获得鼓励奖。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森健、企划业务部副部长福岛启之辅、企划业务部主管戴民英、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副主任张浩川副教授、魏全平副教授、沈浩老师等参加颁奖仪式并为获奖同学颁奖。
- 12月16日 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原中国驻日本国大使徐敦信先生访问中心,与中心研究员进行座谈。
- 12月17日 中心假座浦之舟餐饮会所举办2012年中日新年交流会,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泉裕泰总领事、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中心客座研究员杜宏先生等出席并致辞。会上,徐敦信大使作特别演讲。上海主要日本研究机构负责人介绍各单位新年计划。中心兼职研究员、中日学术研究机构、日本在华企业代表50余人参加。

(华 莉)

日本研究集林

编步青题

(半年刊)

主 编 胡
令远
副主 编 贺
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 振 声 陈
建安
林尚立 郑励志
胡令远 郭定平
贺 平 徐静波
樊勇明 臧志军

2011 年下半年刊
(总第 37 期)
2011 年 12 月出版

目 录

·政治·经济·外交研究·

- 从“东盟主导”到“集体领导”: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转型
..... 陆文婷(1)
- 从中日关系看东亚合作的模式
..... 西仁塔娜(8)
-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研究
——以《朝日新闻》关于中国三代国家领导人访日报道为例
..... 王怡静(16)
- 中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国际环境因素比较
..... 康 健(24)

社会·历史·文化研究

- 对中国大学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材与日本中小学国语教材的比较研究
——内容异同所体现的现代性课题
..... 田中祐辅(32)
- 梁启超的《黄帝》与伊泽修二的《皇御国》
..... 李 海(43)
- 从汉冶萍借款案看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日关系
..... 周 坚(52)
- 日本女性姓名特征研究 吴 琼(59)
- 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型 徐 青(63)
- 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新篇章
——“江南文化与日本”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 赵建民(68)
- 追思安部一成先生 徐 青(71)
- 附:中心大事记 华 莉(76)

稿 约

一、本刊为日本研究的综合性刊物,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我国日本学研究的繁荣和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为此,本刊特向校内外从事日本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诚意征稿。

二、凡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教育、法学、新闻传媒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均受欢迎。立意新颖及从中日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文章尤受欢迎。

三、来稿要求:

1. 字数一般在五千至一万之间。
2. 文稿请用 A4 纸打印。来稿一般不退,三个月后未接到通知的,请自行处理。
3. 正文前请附“内容提要”、“关键词”;注释务请附在文后。
4. 请详写作者真实姓名(用笔名者)、职称、通信地址(包括工作单位、部门和邮编),以便联系。
5. 来稿请寄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集林》编辑部,邮政编码 200433,同时将电子文本发送至如下邮箱:

huali100@fudan.edu.cn

四、来稿一经采用,即奉致稿酬。